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籩、豆、簠、簋



粉青沙器籩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簋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之 制定背景與朝鮮初期禮制藝術之形成*

李定恩**

【摘要】《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朝鮮初期的禮儀制定過程密切相關，奠定了朝鮮王室祭器制度之基礎。朝鮮在禮制位階秩序上自認為諸侯國，按照諸侯國禮制的需要，從不同歷史傳統的中國祭器圖像中取捨、選擇，制定一套視覺化的祭器規範。另一方面，許稠等朝鮮初期制定禮儀制度的核心人物，皆為崇尚朱熹的性理學者。他們追求理想的古代中國制度「古制」，並將朱熹的復古主義放在中心地位。《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不僅圖像淵源多數來自朱熹〈釋奠儀式〉，顯示對呼應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金屬材質的重視。這也直接影響了禮制藝術的創作，以傳世朝鮮初期的瓷質祭器為例，以瓷器作為金屬材質祭器的替代品；雖然兩者材質迥然不同，但是瓷質祭器仍忠實模仿金屬祭器的圖像，也因而產生特別的瓷器風格。《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建立的禮器規範，在朝鮮時代一直延續下去成為後世禮器典範。尤其，在朝鮮後期之後，可見傳世數量龐大的金屬祭器，由此我們得知此規範成為朝鮮自我傳統被傳承的事實。

關鍵詞：朝鮮王朝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禮制藝術、古制、朱熹、許稠

* 本文曾於研討會口頭報告，部分內容以韓文發表，收錄於《동아시아의 궁중미술: 김홍남 교수 정년퇴임 기념 논문집 [東亞細亞之宮廷藝術: 金紅男教授退休紀念論文集]》(首爾: 韓國美術研究所, 2013)。論文寫作與資料收集期間承蒙諸多韓國與臺灣收藏單位的協助，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石守謙院士、陳熙遠研究員，臺大藝術史研究所陳芳妹教授、謝明良教授、施靜菲教授、盧慧紋教授，臺大歷史系許雅惠教授，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張南原教授與梨花女子大學博物館金珠連學藝研究員的幫助，謹此銘謝。另外，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前言

〈祭器圖說〉收錄於《世宗實錄》(1454)「五禮儀」，「五禮儀」匯集了從朝鮮(1392—1910)開國至世宗(1418—1450在位)時期所擬定的禮儀相關制度，成為朝鮮時代禮儀典範《國朝五禮儀》的基礎。^①《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經過數十年持續進行的朝鮮初禮儀制定有著密切相關。傳世至今的朝鮮初期粉青沙器祭器，反映出《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圖像規範實際影響祭器製作的事實。^②不僅如此，朝鮮時代宗廟祭器與各種祭器圖說相關研究指出，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建立的朝鮮王室祭器製作規範，在朝鮮時代一直延續下去。^③

儒家禮儀制度源於中國古代制度。祭器為儀禮所用的器物，具有固有的圖像傳統。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祭器隨著時代的演進變化發展的事實。尤其，宋代以後，中國祭器的圖像以兩大體系為代表，根據文獻內容重整的聶崇義《新定三禮圖》(962)，以及基於古代青銅器的重新認識與研究的徽宗(1101—1125

① 韓亨周，〈15세기 祀典體制的 성립과 그 추이: 《國朝五禮儀》 편찬과정을 중심으로 〔15世紀祀典體制之成立與其趨勢：以《國朝五禮儀》編撰過程為中心〕〉，《歷史教育》，89(2004)，頁127-161；池斗煥，〈國朝五禮儀 편찬過程 I；古禮·宗廟·社稷祭儀를 中心으로 〔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 I；以古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釜山史學》，9期(1985)，頁145-180。

② 相關研究認為十五世紀前半期粉青沙器祭器，主要以簋、簠、爵、彝以及各種尊等器類為主，忠實地模仿了金屬祭器的形式特徵。安星稀，〈朝鮮時代 陶瓷祭器研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鄭素羅(音譯)，〈朝鮮前期古禮用粉青祭器研究〉，《美術史學研究》，223(1999)，頁5-33；野村惠子，〈李朝陶磁における祭器の變遷〉，《企劃展朝鮮陶磁シリーズ11-李朝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88)，頁14-15。

③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宗廟祭器를 中心으로 〔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韓國東國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河恩美，〈宗廟祭器와 朝鮮時代 祭器圖說 研究 〔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韓國高麗大學文化財學協同課程美術史學專攻碩士論文，2010)。

在位)《宣和博古圖》的兩代系統。^④北宋時期對金石學與古代青銅器的興趣,引起了借用青銅器風格特徵的所謂「仿古銅器」之流行。賦予古代青銅器新的詮釋和意義,其復古主義仿古銅器的圖像,又影響了後期金屬器與瓷器的製作。^⑤

根據以上的研究成果,最近的中國藝術史學界開始關注古代祭器的視覺圖像,在韓國、日本等東亞細亞地區的傳播。其中《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相關兩篇研究關注其匯集中國歷代祭器系統各種不同圖像的事實,在仿古銅器風格的傳播與擴展的脈絡中討論。而且,透過中國仿古銅器的視覺圖像之共享與其對藝術的影響,提出了東亞禮制文化意象形成的議題。^⑥

-
- ④ 根據唐代與宋元時期的考古發掘出土文物的研究,指出以《三禮圖》與《宣和博古圖》為中心的兩種系統並存的事實。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故宮文物月刊》,279期(2006),頁68-83;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期(2003),頁1-26;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頁143-168。
- ⑤ 宋代仿古銅器流行與意義之轉換過程,詳細討論請參見: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23卷1期(2005),頁267-332;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大美術史研究集刊》,10期(2001),頁37-160。除此之外,有關復古主義與古銅器風格流行,多篇論文中有相關討論。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0-1279,” (Ph.D. dissertatio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2010); Yun-chiahn Chen, “Pursuing Antiquity: Chinese Antiquarianism from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7); 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5);另外,可舉中國藝術上的復古主義與後期青銅器相關展覽與圖錄。Philip K. Hu, *Later Chinese Bronzes: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and Robert E. Kresko Collections* (St. Louis: St. Louis Art Museum, 2008);《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Robert D. Mowry, *China's Renaissance in Bronze* (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93); Rose Kerr, *Later Chinese Bronzes* (London: Bamboo Pub.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90).
- ⑥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2期(2012),頁103-170;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頁61-150。

目前韓國藝術史學界並沒有《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專題研究。在藝術史研究領域中，《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最早受到韓國陶瓷史研究者的矚目。由朝鮮初期十五世紀粉青沙器祭器傳世至今，其中有包括窯址出土品。鄭素羅（音譯），〈朝鮮前期古禮用粉青祭器研究〉針對光州忠孝洞窯址出土古禮用粉青沙器，根據出土層位比較明確的推定了生產年代，並進行風格分析。證明《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規範，實際上影響了同時代十五世紀瓷質祭器的事實。^⑦另外，安星稀《朝鮮時代陶瓷祭器研究》討論朝鮮時期從王室到庶民階層所使用的各種瓷器祭器的形式、製作與消費狀況。其中探討朝鮮時代瓷質祭器的製作背景，指出朝鮮前期王室以金屬祭器為主，而瓷質祭器用來代替金屬祭器，並只在地方祭祀或王室俗祭才使用的事實。^⑧

另外，在宗廟祭器相關研究中，金終任的〈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傳世宗廟祭器為主要材料，將不同時期的〈祭器圖說〉作為比較材料，探討朝鮮時代金屬祭器的風格發展。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主要根據傳世祭器與朝鮮時代歷代〈祭器圖說〉，整理了朝鮮時代祭器風格的發展序列與變化。兩者的研究共同指出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祭器之圖像與規範提供了祭器製作的基本框架，在整個朝鮮時代發揮其影響力。^⑨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到朝鮮時代王室禮器製作上，其圖像規範〈祭器圖說〉與實際祭器製作與風格有密切相關的事實。其中，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規範，可以說影響整個朝鮮時代的祭器製作。但是，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相關研究主要關心傳世祭器的風格與發展，將〈祭器圖說〉視為一種說明傳世祭器的風格特徵之來源，祭器圖像跟實際祭器做比對。朝鮮初期祭器和〈祭器圖說〉相關研究主要關注在祭器形式上特徵，雖然探討圖式來源和朝鮮祭器之間的影響關係，但是甚少討論圖式來源形成背後的歷史脈絡。尤以朝鮮時代祭器製作上奠定基礎的《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本身並

⑦ 鄭素羅（音譯），〈朝鮮前期古禮用粉青祭器研究〉，頁12-25。

⑧ 安星稀，《朝鮮時代陶瓷祭器研究》，頁4-22。

⑨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49-80；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頁102-122。

不被關注。不僅圖像構成與制定背景少有研究注意，其發展過程中所接受的中國影響與脈絡，也停留在單一的比較或交流歷史背景之說明。

朝鮮的禮制制定者參考經過很長時間發展的中國祭器體系，在〈祭器圖說〉中建立了符合朝鮮禮儀制度的禮器新視覺圖像。我們從東亞禮制藝術中祭器圖像的發展與共享事實出發，再進一步提問朝鮮對外界的視覺傳統是依何種需求與基準來取捨選擇？祭器在一個國家的禮制中頗有象徵意義，而他們為了建立視覺規範，究竟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從這樣的觀點，筆者認為奠定禮制建立基礎的朝鮮初期，其時代背景值得關注。以朱子性理學為統治理念的新王朝朝鮮來說，國家禮儀制度之整頓是直接影響其統治秩序建立的重要項目。因此可以說朝鮮的禮制反映著朝鮮初期的政治情況與理念。^⑩而且，作為禮制建立的一環，《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可以說是朝鮮禮制理念的視覺投射。在本篇文章中試圖探究〈祭器圖說〉中圖像與視覺規範所代表的意義。主要以朝鮮初禮制建立過程的相關文獻與研究為主，探討朝鮮王室根據何種需求與原則，樹立祭器的規範而創造出特別形式的禮制藝術。

⑩ 關於朝鮮初期禮制，在韓國史學界累積了詳細的研究成果。尤其，關於祀典制度之制定過程與其性質，主要研究著作為如下：金海榮，《朝鮮前期 祭祀典禮 研究》（首爾：集文堂，2003）；韓亨周，《朝鮮初期 國家祭禮 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池斗煥，《朝鮮前期 禮儀 研究－性理學 正統論을 中心으로〔朝鮮前期 禮儀研究－以性理學正統論為中心〕》（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4）；李範稷，《韓國 中世 禮思想 研究－五禮를 中心으로〔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首爾：一潮閣，1991）。除此之外，相關研究可舉鄭東薰（音譯），〈명대의 예제 질서에서 조선국왕의 위상〔明代禮制秩序上朝鮮國王的位階〕〉，《역사와 현실〔歷史與現實〕》，84期（2012），頁251-292。金海榮，〈조선 초기 禮制 연구와 《國朝五禮儀》의 편찬〔朝鮮初期禮制研究和《國朝五禮儀》之編纂〕〉，《朝鮮時代史學報》，55期（2010），頁41-80；金文植，〈조선시대 國家典禮書의 편찬 양상〔朝鮮時代國家典禮書的編撰狀況〕〉，《藏書閣》，21輯（2009）頁79-104；金澈雄，〈조선 초기 祀典의 체계화 과정〔朝鮮初期祀典之體系化過程〕〉，《文化史學》，20期（2003），頁189-207等。

一、《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之淵源與組合

《世宗實錄》附〈五禮序例〉，序中說明，開國初期禮儀制度尚未完善，太宗時代（1400—1418在位）命許稠（1369—1439）撰吉禮序例及儀式，世宗時期命鄭陟（1390—1475）、卞孝文（1396—？），撰定嘉、賓、軍、凶等禮四禮，附於實錄之末。^⑪《世宗實錄》「五禮儀」中不僅記錄了禮制規範，對於需要實際製作的儀禮用器物均有附圖說明。其中〈祭器圖說〉屬於五禮中的「吉禮」，註明了國家祭祀用祭器的大小、材質、用途等，同時附圖說明（圖1）。^⑫根據附圖文字內容，〈祭器圖說〉收錄的總共35件祭器中，其中15件圖樣來自《朱文公釋奠儀》，9件根據《禮書》，4件屬《事林廣記》，4件屬《聖宋頒樂圖》，3件屬《周禮圖》。^⑬其詳細內容為如下表格；

⑪ 「〈五禮序文〉國初，草創多事，禮文不備，太宗命許稠，撰吉禮序例及儀式，其他則未及，每遇大事，輒取辦於禮官一時所擬，上乃命鄭陟、卞孝文，撰定嘉、賓、軍、凶等禮，取本朝已行典故，兼取唐、宋舊禮及中朝之制。其去取損益，皆稟宸斷，卒未告訖，冠禮亦講求而未就。其已成四禮，許稠所撰吉禮，附於實錄之末。」鄭麟趾等撰，《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6），第5冊，頁176。

⑫ 參見《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禮·祭器圖說〉，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0-188。

⑬ 河恩美將祭器圖說所引用的中國文獻之傳世版本中祭器圖，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的圖式與其來源，做形式風格上的比較，指出兩者形式特徵大致相同的事實。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參見頁37-90以及附件〈表1-16〉。許雅惠教授之研究，對《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來源的中國文獻，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與圖像比較。關於〈祭器圖說〉中所引用的書籍，在中國內刊行時期與傳入，請參見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第三章〈圖籍傳播與朝鮮（1392—1910）前期祭器〉。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19-130。

(表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像淵源別祭器之種類與數量

序號	圖像淵源 ^⑭	器類	數量(件)
1	《朱文公釋奠儀》	簋, 豆, 簠, 簠, 俎, 簠, 爵, 玷, 罍尊疏布巾, 著尊, 壺尊, 大尊, 龍勺, 洗壘, 洗	15
2	《禮書》	甗, 鉶, 雞彝, 鳥彝, 斚彝, 黃彝, 山壘, 匕, 辰	9
3	《事林廣記》	牲尊, 象尊, 釜, 鑊	4
4	《聖宋頒樂圖》	牛鼎, 羊鼎, 豕鼎, 鸞刀	4
5	《周禮圖》	圭瓚, 几, 筵	3

根據以上的表格，我們可以發現《朱文公釋奠儀》佔最大的比重。《朱文公釋奠儀》是指稱朱熹（1130—1200）為州縣文廟祭祀典禮祭器，所建立的一套禮器系統《釋奠儀式》，其中也包括了祭器圖。^⑮ 目前流傳至今的朱熹《釋奠儀式》中最古者，有大德二年（1298）刊刻的元碑拓本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而以書籍形式者，只有以《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書名，收錄在清代四庫全書中。^⑯ 四庫全書版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的18種祭器中，其中15件圖像收錄於《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⑰

《世宗實錄》又收錄圖解祭器陳設的〈五禮序禮・饌實圖〉，其中可以看到分別不同祭祀所需的祭器種類與配置（圖2）（圖3-1、圖3-2）。根據其內

^⑭ 作為圖像來源引用的文獻，皆使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採用的名稱。

^⑮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指稱為「朱文公釋奠儀式」、「朱文公釋奠儀」、「釋奠儀」等。在本篇文章中一律稱為朱熹《釋奠儀式》。

^⑯ 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題記系廣西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純臣於嘉定丁丑年（1217）所書，大德二年靜江路儒學教授魯師道所重修刊刻。此外，可舉明朝正德（1506—1521）刊宋立〈新昌縣學禮器圖〉碑復原圖，明代《闕里志》〈禮器圖〉等的例子。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64-73。

^⑰ 因為四庫全書本的圖像比較完整，作為比較對象。另外，《世宗實錄》中簋與簋巾畫在一起，因此算為一件。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7-26。

容，全部的祭祀均使用簋、豆、簠、簋、爵以及坫。^⑮ 在各種祭祀中成為基礎祭器的圖像是根據朱熹《釋奠儀式》而來。但是，在國家的重要祭祀社稷與宗廟等大祀，與先農親享、風雲雷雨、嶽海瀆等中祀所用的甗與鉶，以及王室宗廟祀典中盛水或酒用的雞彝、斚彝、鳥彝、黃彝，皆為《朱文公釋奠儀》沒有收錄的祭器。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此四種彝類、甗與鉶的圖像主要是從宋代陳祥道（1053－1093）的《禮書》中採取（圖4）。^⑯ 如上述，朱熹《釋奠儀式》是為州縣文廟祭祀所設計的儀式規範，因此無法完全涵蓋宗廟社稷等一個國家各種祀典中所需要的祭器。

另有圖像來源為《聖宋頒樂圖》的羊鼎、牛鼎、豕鼎及鸞刀，也是《釋奠儀式》中未見的器形。《聖宋頒樂圖》的原書名是《皇祐新樂圖記》，是於北宋皇祐五年（1053）完成的禮樂書。^⑰ 其中，鸞刀是祭器圖說中說明作為在宗廟中用以切割牲禮時所使用的禮器。^⑱ 圭瓚之圖像淵源於《周禮圖》，亦是宗廟祭祀中所用，是將酒灑在地上用以告神的裸器。^⑲ 根據《世宗實錄》吉禮序例中辨祀內容，以《周禮圖》為圖樣來源的几與筵，以及圖樣來自《禮書》的扆，都是宗廟祭祀中，作為神位設置時所需要使用的禮器。^⑳ 如此，朝鮮的祀

⑮ 參見《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禮・饌實圖〉，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9-201。

⑯ 《禮書》有收錄禮儀相關服飾、物品、建築、禮器圖式。總共150卷，其中卷95至卷104，收錄祭器相關的內容和〈禮器圖〉。陳祥道，〈禮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2。

⑰ Robert C. Provine在朝鮮初禮樂相關研究中，對朝鮮禮樂制定中所參用的韓國與中國文獻進行詳細的考證，指出朝鮮實錄音樂相關記載中出現的《聖宋頒樂圖》，即是北宋阮逸（生卒年未詳）與胡瑗（993－1059）奉命編撰的《皇祐新樂圖記》。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Seoul: IL JI SA, 1988), pp. 75-77.

⑱ 「聖宋頒樂圖云，『禮記，鸞刀，古刀也，用於宗廟。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修古之故。』」《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7。

⑲ 世宗十七年之後，宗廟廟室地板中穿洞做灌地筒，宗廟裸地儀式中使用。崔順權，〈宗廟祭器考〉，《宗廟大祭文物》（首爾：宮中遺物展示館，2004），頁162-163。

⑳ 「每座設扆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竝室內南向。每室鋪筵設几。」《世宗實錄》，卷128，〈五禮〉〈吉禮序例・神位〉，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76。

典制度之下各種祭祀儀式，需要多種不同祭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各種祭祀的基礎祭器圖像，主要是根據朱熹《釋奠儀式》；若是《釋奠儀式》中未見的器形，則參考其他各種禮書。

《朝鮮王朝實錄》中慣稱的《周禮圖》，其實是收錄於宋代禮書《纂圖互註周禮》的〈周禮經圖〉。^{②④}目前傳世的宋刻本《纂圖互註周禮》〈周禮經圖〉中，〈簋豆簠簋登爵之圖〉（圖5）與〈六尊圖，尊壘圖〉（圖6、圖7），以及〈新舊鼎俎之圖〉與〈壘洗勺篚圖〉之中，介紹了兩種不同的圖樣。一種是〈三禮圖〉，另一種是〈禮局樣〉。^{②⑤}這是反映著宋代時，三代銅器意象正以《三禮圖》及《宣和博古圖》兩大系統並存的現象。用〈三禮圖〉與〈禮局樣〉的名稱，同時收錄不同套的圖樣。^{②⑥}〈禮局樣〉是參考北宋徽宗時期《政和五禮新儀》和《宣和博古圖》之圖像，推測為在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禮器局頒布各地的《紹興製造禮器圖》之圖式。^{②⑦}

實際上，朱熹《釋奠儀式》也是很大部分沿用了受到徽宗《宣和博古圖》系統影響的祭器圖像。^{②⑧}因此，《纂圖互註周禮》中〈禮局樣〉與朱熹《釋奠儀式》中祭器圖像，在圖式上顯得頗為相近。以簋為例，《纂圖互註周禮》〈禮局樣〉簋（圖8）和圖樣來自朱熹《釋奠儀式》的〈祭器圖說〉簋（圖9），兩者在胴體質地均用水波紋來裝飾，口沿部則用類似雷紋的裝飾帶來描繪等。又梯形足部中間半圓形鏤空的形狀也是相同的。這種類似的圖式中，朝鮮〈祭器圖說〉中圖像的來源並沒有從《纂圖互註周禮》取得，而是選擇以

②④ 參見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105-115.

②⑤ 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卷1（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5-16、頁19-24。

②⑥ 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頁301-302。

②⑦ 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頁127-128。

②⑧ 朱熹《釋奠儀式》的器類與圖文根據北宋徽宗《政和五禮新儀》以及南宋高宗（在位1127—1162）時期編纂的《中興禮書》，對應《宣和博古圖》的圖式如十二種銅器：豆、簋、簠、牲尊、象尊、太尊、山尊、著尊、壺尊、洗壘、洗、爵等圖像。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83-87。

《朱文公釋奠儀》為來源，這反映〈祭器圖說〉編修者對《朱文公釋奠儀》的重視。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使用的各種祭器的圖像與其組合，顯示朝鮮初期〈祭器圖說〉之編修者，將書籍作為了解中國祭器圖像的視覺材料；對中國祭器的傳統與圖像，取得了相當的知識。《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可以說有意識地以朱熹所制定的祭器圖像作為中心，按照國家祀典制度的需要，從各種不同祭器圖像中，主動取捨、選擇的結果。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雖然匯集了中國歷代祭器圖像，但並沒有引用同時代中國明朝的禮制相關書籍。關於此一現象，筆者根據朝鮮初期禮制相關研究與文獻材料，試圖探究〈祭器圖說〉圖像的取捨選擇的背景和脈絡。

二、諸侯國的禮制—以明朝的交涉為中心

如上述，《世宗實錄》〈祭器圖〉顯示國家祀典制度所需要的祭器之構成。朝鮮王朝從開國之初，以古制為原則，按照諸侯國五廟制的規範，設置宗廟奉祀從始祖和始祖王以下四代祖先。朝鮮王朝開國之後，太祖（1392—1398在位）在即位詔書中指出前朝高麗（918—1392）王室祀典制度違背古制，命令禮曹擬定新的制度。^{②9}太祖四年（1395），在首都漢陽建立了新的宗廟和社稷，然而太祖時期政局不穩定，無法積極進行相關禮制改革，大致仍沿用高麗時代的制度。^{③0}到了太宗時期，政局穩定之後，開始積極進行禮制的改革。

太宗元年（1400）派遣右政丞李舒（1332—1410）向明朝請賜朝鮮藩國的禮制，但是明朝以「中國禮制，不可行於藩國」的理由回絕。明朝回絕了朝鮮頒降明朝禮制的請求，但對冕服和官制的請求卻慷慨的答應。^{③1}因此，太宗時

②9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左廟右社，古之制也。其在前朝，昭穆之序、堂寢之制，不合於經，又在城外，社稷雖在於右，其制有戾於古。仰禮曹詳究擬議，以為定制。」河崙、鄭麟趾等撰，《太祖實錄》，卷1，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一冊，頁22。

③0 池斗煥，〈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 I：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頁154-155。

③1 孟思誠等撰，《太宗實錄》，卷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一冊，頁219。

期只得參考中國歷朝制度進行改革，太宗朝前半期仍然保持根據明朝的制度來制定儀禮的立場，各種國家祀典之編制和祭祀儀禮制定上參閱了高麗末年傳入朝鮮的《洪武禮制》。《洪武禮制》是在洪武年間（1368—1398）官修的禮書之一。其內容針對布政司、府、州、縣等各個地方單位進賀、出使、祭祀、官服、官階等儀禮相關規定。相關研究指出朝鮮王朝初期《朝鮮王朝實錄》祭祀禮儀相關記載中，「皇明禮制」、「朝廷頒降禮制」、「大明禮制」大致上指《洪武禮制》。^{③②}

但是，《洪武禮制》是明朝的地方行政單位州府郡縣的禮制，其中並沒有包含天子或國王諸侯的宗廟和社稷禮制。因此，無法提供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所有禮制相關內容，太宗年間已經開始出現批判的意見。太宗八年（1408）五月，太上王太祖薨逝，太宗十年（1410）祔太祖與神懿王后神主於宗廟。在太宗十一年（1411）九月，朝鮮朝廷中對宗廟祭儀引起論爭，禮曹參議許稠指出之前太祖祔廟戒齋三日不合於古，也主張遵守大明禮制的不妥當之處。許稠強調「大明禮制所載，乃州府郡縣祭鄉社禮也，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似難遵守」。因此，太宗只得命禮曹參考唐宋和前朝《詳定古今禮》的禮制，制定宗廟祭儀。

太宗在處理太祖的祔廟禮制的過程中，開始進行宗廟改制，因參考的中國禮制之間有不同，遇到制定上的困難。太宗跟禮曹判書僉眉壽（1359—1415）的討論中，表達「宗廟之制，宜奏請時王之制」的意思：

宗廟之制，宜奏請時王之制。禮曹判書僉眉壽對曰：考之於《文獻通考》，只有天子卿大夫之禮，若頒卿大夫之祭禮，則將何如哉？上曰：既賜九章之服，必不頒卿大夫之禮矣。對曰：開國已久，今而始請，無乃已緩乎？上曰：與其不請，寧緩無傷。對曰：我朝祭儀，不遵侯國者頗多。若頒之以太簡，則將如何？上曰：今所用之儀，亦有增減之者。若太簡，則豈無加減之權乎？對曰：高皇帝勅曰：儀從本俗，法守舊章。不若不請。上曰：爵獻後拜之有無，不可不知也。河崙（1347—1416）曰：聞一以知十。今《洪武禮制》，山川社稷皆無拜，祖廟獻爵後無拜，從可知矣。許稠曰：今中國雖無拜，唐、宋皆有之，如之何不拜。上曰：未請問，姑從

③② 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頁46-49。

祔廟之儀。蓋謂無拜也。^{③③}

太宗初期正在進行各種國家祀典之編制和祭祀儀禮制定，禮儀制度並不完整，就透過各種禮制相關書籍，來建立適合朝鮮諸侯國位階的禮制，但實際上卻難以找尋實行細則的相關前例。^{③④}前文中顯示朝鮮朝廷對禮制相關制定過程中現實的考量。尤其，朝鮮向明朝請頒降禮制的理由，朝鮮太宗「與其不請，寧緩無傷」的想法，應該是來自跟明朝的政治關係的考量。換句話說，朝鮮抱持著使用諸侯國位階的禮制才恰當的立場，希望從明朝得到正式的肯定，因而再次向明朝請頒大明禮制。在太宗十一年（1411），朝鮮以「未知聖朝所制藩國儀式」為理由，說明沿用前朝高麗舊禮並不妥當而再次請明朝頒降適當的禮制。^{③⑤}但是，對朝鮮太宗的用心良苦，明成祖回覆卻是只有「只從他本俗」。^{③⑥}

朝鮮正宗元年（1399）賀登極使右政丞金士衡（1341－1407）等明惠帝（在位1399－1402）的咨文中，允許對正宗即位並且提及已「先太祖皇帝，詔諭本國，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聽其自為聲教。今後彼國事務，亦聽自為。」^{③⑦}明

③③ 《太宗實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07。

③④ 金海榮，〈朝鮮初期禮制研究和《國朝五禮儀》之編纂〉，頁51-63；池斗煥，〈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 I：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頁159-162。

③⑤ 「遣參贊議政府事鄭擢（1363－1423）、參知議政府事安省（？－1421）如京師，賀明年正也。且咨禮部曰：本國祖廟及社稷山川文廟等祭，未知聖朝所制藩國儀式，仍用前代王氏舊禮，深為未便。上項祭禮，理合奏請，如蒙頒降，欽依遵守。」《太宗實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08。

③⑥ 「永樂十年（1421）三月初二日，本部官於奉天門，題奏奉聖旨：只從他本俗。憑禮部行文書去，着他知道。」《太宗實錄》，卷2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34。

③⑦ 「賀登極使右政丞金士衡、陳慰使政堂河崙、進香使判三司事僉長壽（1341－1399）奉禮部咨文，回自京師，上冕服躬迎，百官具公服上箋稱賀。咨文曰：建文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準朝鮮國咨，該本國王年老疾病，已令男某，權署勾當，咨請奏聞，明降施行。本月二十六日早朝，本部尚書陳迪（？－1402）等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已先太祖皇帝，詔諭本國，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聽其自為聲教。今後彼國事務，亦聽自為。欽此。擬合移咨，照驗施行。」尹淮、申檣等撰，《正宗實錄》，卷1，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1冊，頁151。

太祖（1368—1398在位）勅書中「儀從本俗，法守舊章」諭旨，表達當時明朝對朝鮮國內政不干涉的基本態度。這也是明朝對朝鮮國內禮儀制度的基本態度。

雖然明朝對朝鮮的頒降禮制的請求表示回絕，但是按照朝鮮對禮制相關物品的請求，賜給朝鮮國王的冕服及冠服規範，顯示朝鮮在禮制位階秩序中的位置。文獻資料上比較詳細記載明朝賞賜冕服的是在朝鮮太宗二年（1402），明惠帝（1399—1402在位）依朝鮮的請求賞賜朝鮮國王冕服：

帝遣鴻臚寺行人藩文奎（生卒年未詳）來，錫王冕服，結山棚備讎禮，上率群臣迎于郊，至闕受勅書冕服，出服冕服行禮。其勅書曰：勅朝鮮國王李諱。日者陪臣來朝，屢以冕服為請，事下有司，稽諸古制，以為：四夷之國，雖大曰子。且朝鮮本郡王爵，宜賜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之義，遠人能自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朝鮮固遠郡也，而能自進於禮義，不得待以子男禮，且其地遯在海外，非恃中國之寵數，則無以令其臣民。茲特命賜以親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諭朕意。嗚呼！朕之於王，顯寵表飾，無異吾骨肉，所以示親愛也。王其篤慎忠孝，保乃寵命，世為東藩，以補華夏，稱朕意焉。^{③⑧}

在勅書中指出朝鮮本郡王爵，宜賜以五章或七章服。但是特別賜以親王「九章之服」，所以示親愛。當時，建文元年（1399）燕王起兵，明朝內部爆發了靖難之役，太宗元年（1400）惠帝派遣使臣向朝鮮要求朝貢一萬匹戰馬。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之下，惠帝對朝鮮保持懷柔政策。明惠帝賜給朝鮮冕服的前幾個月，在建文三年（1400）十二月，燕王軍南下準備直接攻擊京師南京。^{③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明惠帝對朝鮮賞賜冕服，特別強調賜給朝鮮九章之服的恩典。

到了明成祖即位元年，太宗三年（1403）朝鮮透過謝誥命使崔伊（活動於十五世紀前半）請賞賜冕服和世子所需書冊。^{④⑩}同年十月明成祖派遣黃儼

^{③⑧} 《太宗實錄》，卷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26。

^{③⑨} 朴元燾，《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2002），頁122-129。

^{④⑩} 《太宗實錄》，卷6，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75。

(?—1425年)等使臣，賞賜國王冕服和官服等，《朝鮮王朝實錄》詳細記載著賞賜物品。^{④①}明成祖賞賜太宗的冕服的記載中，雖然沒有章紋的記錄，但是，《明史》記載中可以看到明示賞賜九章的內容：

芳遠表謝，因請冕服書籍。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及經籍綵幣表裡。^{④②}

《明史》記載著賞賜給朝鮮國王冕服和書籍，其實是因為朝鮮請求的關係，說明了明成祖欣賞朝鮮對中國禮的仰慕，賜金印和誥命的同時，賞賜朝鮮王和王妃的禮服。相關研究指出當時賞賜內容中，九旒平天冠與永樂三年(1405)制定的親王制度一致，也代表比明朝親王的冕服。^{④③}明朝和朝鮮雙方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互相的認同，賞賜九章表示對朝鮮職秩比為親王的待遇。朝鮮信奉儒家思想為政治理念，在禮制秩序上以中國為中心，自我定位為天子國之下的諸侯國並引以為傲，積極地要求相應的禮遇。

其中一例，在太宗八年(1408)派遣到明朝京師的世子將參加正月祭天地禮儀。但是，世子沒有穿朝服的理由，安排到九品之外：

帝御奉天殿，勅千官齋戒。將以正月辛酉日祭天地也。千官具朝服行禮，世子以常服，立於西班九品之下。既退，李茂(1355—1409)使李玄(?—1415)，言於禮部書鄭賜(?—1408)、趙玘(1364—1436)曰：太祖皇帝賜我國冠服之詔，有曰：國王一品，準中朝三品。在辛未年高麗世子定城君(生卒年未詳，恭讓王一年(1389)冊封為世子)入朝，位在六部

④① 「朝廷使臣黃儼、朴信(1362—1444)、翰林待詔王延齡(生卒年未詳)、鴻臚寺行人崔榮(生卒年未詳)至，齋冕服及太上王表裏、中宮冠服、元子書冊而來。設山棚結綵備讌禮，上率百官，迎于西郊，至敬德宮受賜。禮畢，儼入內，傳冠服于靜妃(1365—1420)出，上行禮，如太平館設宴。禮部咨曰：欽依給賜朝鮮國王并王父段匹書籍等件及中宮殿下賞賜王妃冠服禮物，除交付欽差內官太監黃儼等齋去外，理合移咨本國，知會施行。」《太宗實錄》，卷6，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81。

④②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08，頁8284。

④③ 全惠淑(音譯)、劉在韻(音譯)，〈조선 태종대 관복제정에 관한 연구 [朝鮮太宗朝冠服制定相關研究]〉，《服飾》，第56卷7號(2006)，頁74-75。

尚書之次。今使我世子，不間於朝列，而位於九品之外，與野人、獐子雜處，願親奏陛下。尚書曰：可。既而帝移御西角門，世子升陛奏曰：在太祖時，以外國蒙賜中朝衣冠，惟我國耳。今臣無朝服，序於九品之外，伏望聖察。帝召鄭賜問曰：朕已令位於二品，何故不然？賜對曰：無朝服故也。帝曰：可依靖江王兒子之例，製朝服祭服以與之，令陪祀天地壇。李茂等言於禮部曰：天子既許世子陪祀，陪臣願從世子與祭。兩尚書曰：此事不必奏聞。宰相五人從事官二人，可以與祭，其具姓名保單以來。乃以保單呈禮部受牙牌八、面陪祀官牌一、供事官牌七。帝使黃儼至會同館，賜世子朝服祭服。^{④④}

《朝鮮王朝實錄》記載中「位於九品之外，與野人、獐子雜處」似乎傳達朝鮮世子位於野人、獐子之間的不當，描述不可接受的事實。明成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命「依靖江王兒子之例，製朝服祭服以與之，令陪祀天地壇」。這代表明成祖賜給朝鮮世子的地位相當於明親王的兒子。這也間接表示明成祖在明朝的官服職秩上，將朝鮮國王放在明朝親王位置的想法，這意味著互相的認同上的一致。靖江王是明太祖時期冊封的藩王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將自己的兒子冊封為各地的藩王。^{④⑤}明代藩王是雖然有俸祿，但沒有實際政治權利的名譽職，在禮制上有周代諸侯國的禮遇。根據相關研究，明代宗室出土的文物，其中包括禮儀相關的親王、王妃的各種冠冕，尤其九旒冠的出土證實了，明代親王可類比為古代諸侯王，禮儀上定位為僅次天子的位階。^{④⑥}靖江王是唯一一個非朱元璋親子的藩王。在明太祖在洪武三年（1370），將自己長兄的孫子朱守謙（1361—1392）冊封為靖江王。^{④⑦}以上內容顯示明成祖在禮制秩序上，給朝鮮國王的禮遇是相應於明朝以血緣關係成立的藩王位階之事實。

^{④④} 《太宗實錄》，卷15，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434。

^{④⑤} 洪武時期（1368—1398）到永樂六年（1408）之間，總共23位親王分封各地。張德信，〈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177（1985），頁76-91。關於明代藩王與相關文物，以及其對明朝藝術文化的影響，請參閱Craig Clunas,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2013)。

^{④⑥} 蘇德榮，〈明代宗室出土文物的歷史價值〉，《南方文物》，第1期（1993），頁54-56。

^{④⑦} 關於靖江王的相關研究，請參閱張偉，〈明代靖江王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明成祖元年賞賜給朝鮮的冕服，後來描繪成圖收錄於《朝鮮世宗實錄》〈五禮儀〉圖說中，冕服圖旁邊還說明為「殿下冕服，依永樂元年（1403）賜與之制」（圖10）。^{④⑧} 明朝藩王魯荒王朱壇（1370—1389）墓出土的九旒冠傳世（圖11）。^{④⑨} 雖然《朝鮮世宗實錄》〈五禮儀〉「冕」則是九旒冠，以圖畫記錄實物而其描繪相對簡略，但是，同時期明朝親王朱壇墓出土九旒冠實物，顯示形制上的相似性。側面看有上端金簪鈕與下端兩個小的纓鈕以及孔周圍裝飾花瓣的形式特徵（圖10-1）。

明朝對朝鮮賞賜的冕服，事實上朝鮮國王在朝鮮的典禮中皆直接採用。朝鮮國王在典禮中持續穿明朝賞賜的冕服，不但並未自行製作複製品，也因為認定天子御品不可改造，而不管大小是否適當，未經修改就直接穿著。^{⑤⑩} 世宗二十五年（1443），派遣護軍金滉（生卒年未詳）為謝恩使赴大明京師，齎請冠服咨文中提到，永樂年間所賞賜的冠服，經過四十年時間，由於每次行禮時常穿，現已垢污不潔的理由奏請。^{⑤⑪} 在世宗二十五年奏請賞賜冕服，在世宗二十六年（1444）受到冕服和常服。世宗二十六年明英宗皇帝（1435—1449，1457—1464在位）賞賜的冕服也是九章絹地紗袞服，也是相當於親王

④⑧ 《世宗實錄》，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222。

④⑨ 藩王墓出土王室服飾及相關文物，請參閱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Xiao-neng Yang, “Ming Art and Cultur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Part 1: Royal and Elite Tombs,” *Orientations*, vol. 31, no. 5 (2006.6), pp. 40-43; Craig Clunas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The BP Exhibition: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4), pp. 68-77.

⑤⑩ 相關研究指出到朝鮮仁祖時期（1623—1649在位），明朝所賞賜的冕服的內容是同樣的。明亡之後，朝鮮不接受清朝的冠服制度，而襲用明朝的冕服，沿用過去明朝所賞賜的冕服制度，朝鮮國內製作。柳喜卿，《韓國服飾史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77），頁243-250。

⑤⑪ 「欽依祇受，傳至當職，經今四十餘年，每遇聖節正至賀禮及迎詔奉祀等項行禮時分，常川服用。只緣年久，所有冠服，垢污不潔，理宜奏請。此合行移咨，請照驗，煩為聞奏，給降施行。」《世宗實錄》，卷10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6），第4冊，頁531。

職秩的。^{⑤②}

根據《明史》〈外藩冠服條〉中明朝對外藩賞賜冠服的記錄，記載中賞賜冠服的藩國，除了朝鮮和前朝高麗國之外，只有琉球國。但是，永樂年間賞賜給琉球國的衣袍只比照二品官級而已。^{⑤③}相較之下，賞賜朝鮮國王九章冕服，親王級的服飾待遇，意味著朝鮮國在明朝禮儀秩序中占重要的位置。朝鮮向明朝積極請求冕服，也代表朝鮮試圖加入明朝禮制體系中，並希望得到明朝對此禮制職秩上地位的肯定。前面所述，在朝鮮禮制制定上的自我定位為天子國之下的諸侯國，因此明朝所賞賜的九章冕服帶給朝鮮自我認知的肯定。九章冕服為代表的明朝賞賜禮服，也可以說是朝鮮在禮儀秩序上地位的物質象徵。

朝鮮的禮制制定上，雖然明朝沒有頒降完整的禮制，但是在外交交涉上賞賜冕服的例子，反映雙方互相承認為天子國與諸侯國的關係。禮制秩序上的階位是禮制制定上的大前提，朝鮮在禮制制定時認定中國古代制度中諸侯國的禮制為最理想的基準。而明朝初期放任不干涉的態度則成為太宗時期禮制建立過程中成為一個轉折點，朝鮮自此開始積極研究中國歷代的禮制，並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才完成屬於自己的禮制。後來朝鮮為了建立適合自己諸侯國位階的禮制，更為積極的追求古制，並開始相關制度的研究。^{⑤④}

朝鮮在禮制制定上自我定位為諸侯國的認識與古制的追求，可以說是大幅影響了祭器圖說的制定，以其中以扮演主導角色的許稠為中心，探究具體的情形。

⑤② 「頒賜冕服九旒香皂皴紗平天冠一頂、九章絹地紗袞服一副、深青粧花袞服白素中單、纁色粧花前後裳、纁色粧花蔽膝、纁色粧花錦綬、纁色粧花珮帶、紅白素大帶、玉圭一、大紅素紵絲一雙、大紅平羅銷金雲龍夾包袱大三、紅紬絹單一、茜紅包裹氎三。常服香皂皴紗翼善冠一頂、玉帶一、袍服三襲各三件、紵絲大紅織金袞龍暗骨朵雲袍、青暗花裕褌、黑綠暗花貼裏、紗大紅織金袞龍暗骨朵雲袍、青暗花裕褌、鸚哥綠花貼裏、羅大紅織金袞龍袍、青素裕褌、柳青素貼裏、皂鹿皮靴一雙、大紅熟絹冠盞一、大紅熟絹單包袱五疋、紅漆服匣一。」《世宗實錄》，卷10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頁548。

⑤③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67，頁1655。

⑤④ 韓亨周，〈15世紀祀典體制之成立與其趨勢：以《國朝五禮儀》編撰過程為中心〉，頁132-134。

三、古制之傾向與許稠

許稠是當時最有權威的禮學者，是從太宗至世宗年間主導禮制整頓與營運的核心人物。根據《世宗實錄》「五禮儀」序，古禮是以許稠所編撰的內容為基礎。^{⑤⑤} 朝鮮到了太宗時期政局穩定之後，開始積極進行禮制改革。為了國家禮制制定設置了儀禮詳定所，其主要任務是擬定禮儀典章制度以及相關法令。^{⑤⑥} 儀禮詳定所的主要官員由朝廷禮學權威所組成，太宗十一年（1413）許稠以禮曹參議的身份參與儀禮詳定所的業務。^{⑤⑦}

當時禮曹所擬定的禮制大多是在許稠的主導之下進行。按照各種國家祀典的重要性，完成了大·中·小祀的分等，包括宗廟各種祭祀儀式也大多被制定完成；在太宗十六年（1418）提交〈諸祀序例〉。^{⑤⑧} 相關研究指出，實際上太宗後期出現了禮制參考古制的比例開始大幅增加的現象，並認為這與在太宗十一年（1411）初，許稠成為禮曹參判之後主導禮儀制度的建立完善有關係。^{⑤⑨}

許稠身為國家禮儀的立案者，值得注意的是他積極主張重視古制的觀點。朝鮮初期禮制的相關討論中，「古制」指稱為「古時候制度」，但僅限定為中國古制，跟稱為過去制度的「舊制」不同。古制意味著理想的古代中國制度，而且古制成為與中國現在王朝之法規或制度的「時王制度」相對的概念。^{⑥⑩} 許

⑤⑤ 「國初，草創多事，禮文不備，太宗命許稠，撰古禮序例及儀式，其他則未及，每遇大事，輒取辦於禮官一時所擬……其已成四禮，許稠所撰古禮，附于實錄之末」《世宗實錄》〈五禮序例〉，卷12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76。

⑤⑥ 任用翰（音譯），〈조선 초기 儀禮詳定소의 운영과 기능 [朝鮮初期儀禮詳定所的營運與功能]〉，《實學思想研究》，24（2002），頁83-93。

⑤⑦ 任用翰（音譯），〈朝鮮初期儀禮詳定所的營運與功能〉，頁93-95。

⑤⑧ 韓亨周，〈許稠와 태종-세종대 國家儀禮의 정비 [許稠與太宗-世宗時期國家儀禮之整頓]〉，《民族文化研究》，44（2006），頁291-292。

⑤⑨ 江文植，〈태종-세종대 許稠의 禮制정비와 禮인식 [太宗-世宗時期許稠的禮制整頓和禮意識]〉，《震壇學報》，105（2008），頁127-128。

⑥⑩ 尤其，有關祀典制度中古制的參考與採用，參見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中〈祀典整備上古制之參用〉章節，其中整理了具體例子與詳細內容。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頁66-97。

稠對作為時王的明朝制度抱持反對的立場。當時輸入朝鮮的明禮制是一般州縣地方單位所實行的《洪武禮制》，許稠認為《洪武禮制》並不適合作為諸侯國的朝鮮採用。^{⑥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是屬於以許稠所撰寫內容為基礎的古禮，由此可以推測〈祭器圖說〉之制定與許稠有關聯。權近（1352—1409）文集中收錄「新刊釋奠儀式跋」，其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祭器圖說〉中朱熹《釋奠儀式》佔重要比例的情形。

古者釋奠于學，其禮極簡，其詳不傳也。自唐有開元禮，宋有政和新儀，然亦廢墜，多莫之行。紫陽朱文公每嘆於此，屢請舉行，且有志於改正其節次，而卒莫之就。寧國府學所刊儀式，乃先儒孟君之縉取紫陽釋奠儀，湖學冕服圖粹為一編，而釋奠須知、滄州舍菜儀并載于後，其神位向背、器服制度與夫登降酌獻之儀，無不備載。獨所謂紫陽儀者，亦因開元之舊文公嘗欲改正而未就者也。

逮及庚辰之歲（1400），全羅道觀察使咸公悼州縣釋奠之失儀，報聞于國，求得儀文於成均，將鋟諸梓，以囑府尹柳公，公亦樂從之。未幾，廉使趙公代咸公繼至，董功益力。時判官許君嘗在成均，講究是禮甚悉者也。觀其所得儀文未全，乃白趙公，更報于國，始得寧國全文以刊，又以元朝至元儀式附之，是其節次先後，於文公所欲改正者蓋庶幾焉。故今成均遵用之……。^{⑥2}

權近的文章中轉述在朝鮮初期禮制尚未完備的情況之下，地方官員們向中央主張完善文廟祭孔祭祀儀式規範的必要性，以及其禮儀制定的過程。同時在這過程中，許稠作為精通禮制研究的人物，扮演著當儀式規範不完整時，加以

⑥1 江文植，〈太宗-世宗時期許稠的禮制整頓和禮意識〉，頁125-128；金海榮指出太宗時期後半期以後，《洪武禮制》的影響明顯減少。金海榮，《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頁46-62。

⑥2 權近著，《國譯叢書陽村集》III（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1995），頁175-177。韓文譯文記為「政和信儀」，對照後面附錄《陽村集》卷22之原文，本文中改為「政和新儀」。原文參見《國譯叢書陽村集》III，頁63-64。

判斷的角色。^{⑥3} 因為許稠的見識與努力，而能夠取得了寧國府學所刊行，儀式程序完整的《釋奠儀式》，並根據此內容準備及執行新的釋奠祭祀規範。^{⑥4} 收錄於《世宗實錄》的許稠列傳中也記錄許稠改正了違背古制的釋奠儀禮。^{⑥5}

寧國府學刊行的《釋奠儀式》中備載有器服制度的這個事實，顯示許稠應該有機會實際參考以朱熹《釋奠儀式》為基礎的祭器制度。《釋奠儀式》中朱熹概歎州縣文廟的祭祀大部分沿用來自《三禮圖》的祭器，而根據中國古代三代祭器的圖像建立儀式規範。朱熹數次向朝廷建議，但其生前並未受到正視。朱熹《釋奠儀式》是在他死後五十年的十三世紀前半期，才開始以刻在碑上或地方刊本的形式刊行流傳。^{⑥6} 權近的文章中提及在朝鮮文廟釋奠禮儀上參考了寧國府學的《釋奠儀式》，可以推測應該是在這樣的脈絡中，南宋時期刊行的版本。^{⑥7}

⑥3 許稠在太宗一年（1401）初任命為完山判官。參見《太宗實錄》，卷1，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194；而且，到了第二年7月記載記錄為「前完山判官許稠為吏曹正郎」參見《太宗實錄》，卷4，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243。由此推測該跋應該在許稠任判官的太宗一年初到太宗二年（1402）夏天間所寫。另外，完山判官則是全羅道全州地區的地方官，全羅道觀察使向中央提報州縣釋奠之失儀，求得式之改正的事實，說明許稠參與此過程的脈絡。

⑥4 寧國府在南宋乾道二年（1166）升宣州為寧國府，治所在（宣城縣，今安徽省宣州市）。轄境相當今安徽省宣州、寧國、南陵、涇縣、黃山等市與縣。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為寧國路，明初洪武年間（1368—1398）復為寧國府。清代屬於安徽省，1912年廢止。馬曉光，《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843。

⑥5 「丁丑，拜成均典簿。時國家草創未遑，釋奠先聖，頗違古制，稠獨慨念，乃白兼大司成權近，求得釋奠儀式，講明改正。」《世宗實錄》卷87，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頁259。

⑥6 陳芳妹教授的相關研究中，根據在嘉定十一年（1218）朱熹四川弟子度正（紹熙一年（1190）進士），提及〈申明釋奠禮〉時，直稱〈先生此書〉，又在紹定五年（1232），兩浙路慶元府州學教授陳松龍（紹定二年〔1229〕進士），為州學置有《明學類編文公釋奠禮三十三板》等的文獻記錄，推論朱熹死後可能以不同刊刻形制、書名在各地刊行。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67-80。

⑥7 至於跋文中「先儒孟君之縉」，有南宋末活動的人物孟之縉的記錄。他是在淳祐四年（1244）童科賜童子出身，德祐元年（1275）跟寧國府一樣屬於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省當塗縣）知州的身份舉城降元。參閱昌彼得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4），頁1305。

雖然許稠當時所參考的寧國府學所刊《釋奠儀式》，具體如何已不得而知。但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依據朱熹《釋奠儀式》的祭器圖式，其形制特徵與傳世至今的朱熹釋奠圖，包括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圖12）、四庫全書版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圖13）等相近。⁶⁸ 其中，根據南宋時期原碑，在元代重修刊刻的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與「新刊釋奠儀式跋」中寧國府學刊行的《釋奠儀式》，在流傳時空相當接近。《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依據朱熹《釋奠儀式》15件祭器附圖文字，其中重量、材質以及高度、長度、深度、口徑等尺寸等文字敘述幾乎相同。⁶⁹ 特別是，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式有相當近似處。以壺尊（圖12-1）、（圖14）為例，雖然前者為碑刻拓片描繪相對簡略有部分殘缺，但是不難看出兩者整體形狀上相似之外，共同於肩部與腹部設有裝飾帶，以螺旋紋鋪滿，值得注意的是兩者腹部裝飾帶中間同樣具備一條明顯的縱向條紋。其紋飾細節描繪上一致的表現，顯示兩者圖式上有高度相似性。由於兩者在圖式、文本方面皆相當相近，由此推測朝鮮初期許稠等所參考的《釋奠儀式》中，很可能其中包含祭器圖式，並且可能是宋元時期所流傳的版本。

權近在「新刊釋奠儀式跋」中記載朱熹為了文廟禮儀改正而奮鬥，且這是為了克服宋代以前舊制的事實。這顯示權近能正確了解了朱熹《釋奠儀式》在禮器傳統中的歷史定位與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權近與許稠等人繼承了朱熹復古主義理想與理念的事實。權近為朝鮮開國功臣，也是朝鮮禮學之權威：他與鄭道傳（1337－1398）從太祖時期開始，在樹立王朝的政治權威，禮制的建立與營運上具有頗大的貢獻。而且，他具有禮學方面淵博的知識。長時間擔任成均館之首長大司成一職的事實，意味著他的禮學學風在成均館教學中可以繼

⁶⁸ 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99-100。

⁶⁹ 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中將「尺」寫為「赤」，但簋、豆、簠、簣、俎、爵、坫、冪尊疏布巾、著尊、壺尊、大尊、龍勺、洗的尺寸、重量等敘述完全一致。唯有簠，疊尺寸描述中稍有落差。例如，《祭器圖說》的疊「深七寸一分」，簠「長二尺八寸」，元代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分別為「深七寸二分」，「長二赤八分」。

續傳承下去。^{⑦⑥} 這幫助我們了解權近寫《新刊釋奠儀式跋》的理由及他對朱熹《釋奠儀式》之歷史脈絡有相當理解的背景。尤其，許稠曾在權近門下學習。我們可以從朝鮮初期禮學傳統與傳承的關係中來理解他立足於古制而根據朱熹《釋奠儀式》改正朝鮮的釋奠儀禮的事實。^{⑦⑦}

在南宋（1127—1279）時期於南方開始發展的朱子學，是進入元朝（1277—1368）之後才開始北上，主要是由姚樞（1203—1280）和趙復（生卒年未詳）到北京，建立書院培養學生，而開始在北方漸漸普及。而高麗時期朱子性理學的傳入，主要是透過赴京高麗臣子在北京接觸的元代北方性理學。元朝將朱子學定位為官學，尤其科舉的重心就是朱子的《四書集註》，並以它做為教育選材學問的基礎。高麗從當時的元都引進性理學，所接觸到的就是朱子性理學為主。因此，性理學中只有朱子學正式傳入高麗，繼而開始影響了高麗的儒學和教育系統。^{⑦⑧} 最初安珣（1243—1306）導入朱子性理學之後，白頤正（1260—1340）是實際上從元學習朱子學的人，忠烈王三十一年（1305）入元，他在留在元都十餘年，尋求程朱性理書之後回來。權溥（1262—1346）曾兩度赴元，當時《朱子四書集註》刊行普及，引導高麗儒學進入朱子學潮流為主流。^{⑦⑨}

朝鮮的開國主導勢力是朱子性理學者，因此在朝鮮禮制制定中，朱子思想

⑦⑥ 權近的著作《禮記淺見錄》是根據陳澧（1260—1341）《禮記集說》所撰寫的。陳澧的父親陳大猷（紹定二年〔1229〕進士）是饒魯（1193—1264）之徒弟，且饒魯為朱熹的女婿黃幹（1152—1221）之門下。李範稷，《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頁171-180。

⑦⑦ 南秀文（1408—1442）所寫的許稠墓志銘中，記錄許稠幼年時受業於權近，禡王九年（1383）年十五歲時中進士舉，十七歲登司馬試。墓志銘內容參見河陽許氏敬公派宗親會編，《敬庵許稠研究》（首爾：弘益出版印刷社，2003），頁399-416。原文參見附錄頁120-133。

⑦⑧ 金忠烈，《高麗儒學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頁266-271。

⑦⑨ 高麗末朱子性理學的導入與相關文人的研究，主要參考以下：鄭玉子，〈麗末朱子性理學의 導入에 대한 試考-李齊賢을 中心으로 [關於麗末朱子性理學導入的試考-以李齊賢為中心]〉，《震壇學報》，51（1981），頁29-33；金忠烈，〈麗末性理學的引進及其形成過程〉，《高麗儒學思想史》，頁271-320；申千湜，〈麗末鮮初性理學의 受容과 學脈 [麗末鮮初性理學之受容與學脈]〉，頁44-69。

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首先，制定朝鮮禮制制度的核心人物都是崇尚朱子的性理學者。朝鮮初期性理學以官學派學者為中心，突出政治思想的一面，成為國家治國理念，在朝鮮初國家禮制的建立中扮演著重要的理念根據。^{⑦④} 朝鮮初進行的一系列的禮制改革中，以性理學的正統論為主要理念，根據宗法制度建立與王位的繼承、廟制與孔子文廟的改制、脫離了前朝高麗的佛教儀式而重新建立國家喪禮制度等。^{⑦⑤} 其中，朝鮮王室原廟文昭殿制度的整理過程中，亦可以看到從高麗時期佛教真殿轉換成朱子儒學儀式的變化。^{⑦⑥} 高麗時代按照佛教方式，原廟中設置影幀，朝鮮開國之後從太祖、太宗朝原廟中繼承高麗制度，佛教式設影幀並且供奉素果，具有佛教真殿的特徵。但是到了世宗年間，脫離佛教式真殿的性質，成為國王的家廟性質，供奉肉膳，神主替代影幀，供祀始封之君太祖和四代。^{⑦⑦}

朝鮮初期禮學研究上朱熹佔了重要的位置。朱熹留下禮制相關經典之研

⑦④ 朝鮮性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初期是接受外來的性理學，吸收並理解的過程，到了十六世紀，對性理學的瞭解更為深化，逐漸發展成朝鮮性理學。金基柱，〈여말선초 주자학의 전개과정과 시기별 특징 [麗末鮮初朱子學的展開過程與時期別特徵]〉，《陽明學》，18（2007），頁131-160。

⑦⑤ 池斗煥，《朝鮮前期禮儀研究－以性理學正統論為中心》（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4）。

⑦⑥ 宗廟原是以太祖廟為中心，其左右按照昭穆順序建立祠堂，到了後漢明帝（57－75在位）供奉在先王光武帝（25－57在位）祠堂中，開始出現按照順序供奉後代王的同堂異室形式。因為太祖廟中供奉後代王的神主，而宗廟又稱太祖廟或太廟。在韓國最早建立宗廟的是三國時代新羅，後來的高麗與朝鮮也都有宗廟制度。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宗廟祭禮》（首爾：民俗園，2008），頁10-24；原廟是正廟之外再立的廟，起源於漢惠帝（西元前195－188在位）在高祖（西元前205－195在位）的故鄉沛縣，立奉祀高祖的廟。文昭殿在太祖五年（1396）建立，奉祀朝鮮太祖妃神懿王后韓氏（1337－1391）的祠堂，原名為仁昭殿。在世宗十四年（1432），在景福宮北邊新建原廟，同年10月文昭殿與奉祀太宗與元敬王后（1365－1420）的廣孝殿的神位皆移過來供奉，並沿用文昭殿的名稱。《東洋學大辭典》第二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6），頁731。

⑦⑦ 池斗煥，〈朝鮮前期國家儀禮〉，《분청사기제기：하늘을 땅으로 부른 그릇 [粉靑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湖林博物館 新林本館，2010），頁200。

究書籍《儀禮經傳通解》是以中國古代禮書為主要材料，進行了文獻梳理、注釋的具體成果。^{⑦⑧} 朝鮮禮制制定與實際禮儀執行過程中，禮學之基本經典《禮記》、《周禮》、《儀禮》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及朱熹門下文人黃幹所增修的《儀禮經傳通解讀》，是朝鮮禮制討論中常被引用的禮書。換句話說，朱熹對禮儀的研究與註釋內容成為了朝鮮禮儀制定的參考書，在朝鮮禮制運用上起了很大的作用。^{⑦⑨}

除了祭器圖說中朱熹所制定的釋奠儀占重要的比重，《世宗實錄》禮樂相關制度中，成為重要依據的《律呂新書》（1187），也可以看出朝鮮初禮儀制定中對朱熹的重視。《律呂新書》是宋代蔡元定（1135—1198）的著作，蔡元定是朱熹同時代的人，朱熹亦給了《律呂新書》很高的評價。1415年，《律呂新書》收錄於《性理大全》，在1426年明宣宗（1426—1435在位）賞賜《性理大全》給朝鮮。從《律呂新書》傳入朝鮮後便受到重視，第二年即被刊刻出版，並且在世宗時期在經筵中講述。^{⑧⑩} 除此之外，朱熹在《儀禮經傳通解》的卷十四中被收錄的詩樂12篇，成為世宗時期製作雅樂譜的來源，制定為朝會樂。雖然朱熹對禮樂相關著述不多，但是朝鮮初禮樂制定中也相當受重視。^{⑧⑪}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前一頁是造禮器尺（圖15），且注明其根據為朱熹《釋奠儀式》。造禮器尺作為〈祭器圖說〉首頁，這反映著當時朝鮮禮制制定者，對祭器製作上度量標準的重視，以及追求正確製作祭器的事實。^{⑧⑫} 朝鮮王室嚴格要求祭器製作時要特別使用造禮器尺，作為祭器製作專

⑦⑧ 孫致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3-4。

⑦⑨ 以上禮儀相關經典被引用。關於禮制制定上所參考的中國與韓國禮書，詳細研究請參考李範稷，〈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頁198-203。

⑧⑩ Robert C. Provine,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pp. 84-87.

⑧⑪ 張師勛，〈世宗朝音樂研究—世宗大王의 音樂精神〔世宗朝音樂研究—世宗大王的音樂精神〕〉（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1999），頁99-100。

⑧⑫ 造禮器尺長度為28.9cm，鼎足山本和太白山本原籍中大小一致。參見《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6），第5冊，頁2，〈凡例之八〉。

⑧⑬ 朝鮮時代造禮器尺專門使用於祭器製作。崔公鎬，〈朝鮮初期의 工藝政策과 그 理念〔朝鮮初期工藝政策與其理念〕〉，《美術史學研究》，194/195（1992），頁83。

屬的標準尺規。^⑧ 太宗時期在為了制定一種禮器幣帛之長短與顏色的討論過程中，由禮曹根據《杜氏通典》與《文獻通考》（1319）等考證中國歷代制度之後，記載「今我朝所供之幣，有違古制，其色與長，一依古制，皆用朱文公造禮器尺」。^⑨ 也就是說，古制成為制度的標準。透過考證判斷為違背古制的部分，則一依古制改正，並以朱文公的造禮器尺作為標準尺規。世宗時期朱熹《釋奠儀式》之內容不僅成為禮器製作上的參考，還成為按照古制決定大小祭祀時間的重要依據。^⑩

許稠可以說是朝鮮初期禮制制定上尚古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不僅是禮制本身內容、相關器物的製作上古制成為重要尺度，從造禮器尺的使用中可以看到對此的嚴格執行。在禮制樹立過程中，朱熹的禮制觀與他所制定的祭器規範，被朝鮮初期禮制制定上認為理想的古代禮制，從而在現實中被大量參考而實際使用。

四、理想的體現—視覺化的祭器規範之創造與傳承

〈祭器圖說〉呈現了朝鮮王室清楚地認識，在禮制制定過程中，對已有祭器圖像嚴謹的考證與視覺化之重要性；並且再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新的規範。以世宗時期奉常寺所藏銀瓚為盜所竊而討論重作為例：世宗指出當時在宗廟祭祀親享用銀瓚與銅爵，而攝行中使用銅瓚與木爵是沒有根據的，所以為了禮器制定命令集賢殿考證古代瓚與爵之制。朝鮮王室祭祀用祭器之製作上，祭器的材質也是朝鮮朝廷嚴謹又慎重選擇的重要項目。在此過程中考證了中國上古時

⑧ 「禮曹詳定祭祀用幣之制。上言：今我朝所供之幣，有違古制，其色與長，一依古制，皆用朱文公造禮器尺。」《太宗實錄》，卷22，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1冊，頁601。

⑨ 「朱文公釋奠儀云：『行事，仲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則古人祭必有期，不以時日之吉凶為進退也。乞自今拜陵祭外，常行大小祭期，依古制用丑時。從之。」《世宗實錄》，卷1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2冊，頁509。

代三皇五帝虞舜與夏后氏的制度，也參考相對時間上距離較近的宋朝史實，來制定了依循古制的祭器。^{⑧6}

到了世宗時期，更加積極進行古制研究。集賢殿的建立之外，針對禮制制定與執行方面也深入研究中國的各種禮制。^{⑧7} 為了籌備朝鮮的禮器制度，甚至追溯古代的例子考證調查。經過如此的過程，朝鮮再決定適合自己的材質與形式的祭器，在過程當中，「遵古制」成為最重要的原則。^{⑧8}

關於祭器圖式的制定留下來的記錄雖然不多，但透過世宗時期犧尊與象尊相關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朝鮮初期在面對不同禮制典範中的理解與選擇的過程。

儀禮詳定所啓：《周禮》尊壘圖及朱文公申明釋奠儀式內，犧尊、象尊圖，皆鑿犧象之背以受酒，又《周禮》六尊圖及《事林廣記》犧尊、象尊，皆畫犧象之形於尊腹。永樂十三年（1415）本國《諸祀序例圖》，亦畫犧象之形於尊腹，其後丁酉年（1417）尊壘鑄成時，鑄犧象之形，而鑿其背，圖與器不同，未免他日致人疑惑。鑿背受酒，畫形尊腹，《周禮》竝存，則本國《序例圖》，亦不可偏廢。請依《周禮》畫腹鑿背，兩存之。從之。^{⑧9}

以上的內容可以說呈現朝鮮當時的處境與選擇。朝鮮禮制制定者熟知他們所參考的中國祭器圖像中有存在不同傳統的事實，在其中取捨選擇是不可避免的。「鑿背受酒，畫形尊腹，《周禮》竝存」記載中的《周禮》，應該就是

⑧6 「遂傳旨禮曹：『遵古制，親享瓚爵皆用銀，攝行瓚爵皆用銅。親享之時，亞、終獻亦皆用銀爵，以為恒規。』令朴堧（1378—1458）鑄銀爵銅瓚。教曰：『今爵既以銀鑄，不宜用木玷，玷亦以銅鑄之。』於是宗廟山陵親享及攝行時瓚爵與玷，一遵古制。」《世宗實錄》，卷78，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4冊，頁100。

⑧7 崔承熙，〈集賢殿研究〉上，《歷史學報》，32（1966），頁1-58。

⑧8 金紅男教授之相關研究中，探究朝鮮禮制藝術中內在的復古主義傾向，指出朝鮮認為中國古代制度是最理想的，尤其周代作為自己的模範，而且禮制藝術形式上也盡量接近為目標。金紅男，〈朝鮮時代宮牡丹屏研究〉，《美術史論壇》，9（韓國美術研究所，1999），頁63-107。

⑧9 《世宗實錄》，卷23，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2冊，頁574。

前面所述的《纂圖互註周禮》。如上述，《纂圖互註周禮》同時收錄根據經典的文字內容創作的《三禮圖》與以古代器物圖像為根據的「禮局樣」之祭器圖式。而且，一種類書的《事林廣記》中除了鼎與爵之外，大部分也沿用了《三禮圖》的圖像。實際上中國禮學者間，對犧尊與象尊的形式做了不同的解釋且意見分歧。^⑩

我們可以看見朝鮮初期祭器的制定上，並非是單純接受某一個特定體系，而是透過各種不同書籍綜合知識，進行比較與考證，來選擇其中最適合的慎重態度。並且，到了世宗時期開國之後所制定的禮制逐漸形成為一個傳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先朝太宗時期所制定的祭祀儀式規範《諸祀序例圖》，可被視為重要而不可廢止的本國先例。

世宗時期制定祭器規範，參閱了中國歷代的相關禮書，但在不同圖式中有了選擇上的困難。然而最後他做出接受兩種不同圖式同時並用的決定。《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犧尊、象尊是根據《事林廣記》畫犧象之形於尊腹，在《國朝五禮儀》根據朱熹《釋奠儀式》重新改為畫犧象之形之器形。^⑪現存有根據兩種不同圖式製作的十五世紀瓷質象尊（圖16）、（圖17），證實了朝鮮初期禮制的特別現象。

除此之外，朱熹《釋奠儀式》追求相應古代祭器的材質，並強調銅的使用，這是朱熹《釋奠儀式》祭器製作規範之特徵。^⑫朝鮮時代祭器製作相關記錄中，可以看到朝鮮初期祭器製作上也固守金屬材質的原則。王室禮儀用祭器一般是鑄造金屬器，除了朝鮮初期宗廟和社稷之外，各地區陵墓和廟中使用的

⑩ 《三禮圖》收錄了歷代各種不同經書的解釋，而在《宣和博古圖》與《釋奠儀式》，根據實際出土的古銅器，制定器型為動物形狀的犧尊與象尊。許雅惠，〈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2012），頁124-126。

⑪ 朴秀晶（音譯），〈조선초기 의례（儀禮）제정과 희존（犧尊）·상존（象尊）의 역사적 의미 [朝鮮初期儀禮制定與犧尊·象尊的歷史意義]〉，《朝鮮時代史學報》，60（2012），頁9-17。

⑫ 陳芳妹，〈與三代同風：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頁413。

祭器也大部份利用銅來製作。^{⑨3}

雖然朝鮮初期金屬祭器失傳，但該時期仿製簋和簠、爵的瓷質祭器中，可以看到忠實模仿原本用銅製作的金屬器的結果。簋的形狀為方形，具有菱角銳利的金屬材質特徵。雖然粉青沙器簋是瓷質製作的，但是也試圖忠實地呈現出方形簋本身的器形。（圖18）。另外，粉青沙器簋也是兩側獸頭裝飾手把，以及蓋部頂部中突起的板型裝飾，器物表面連續性花紋裝飾帶及足部上畫的瑞獸紋飾，也忠實呈現〈祭器圖說〉上所描繪的源自古代青銅器簋的特徵。（圖19）瓷質祭器製作上忠實的表現銅器特徵，這跟當時朝鮮王室對祭器製作的嚴格管理和監督有關係。朝鮮為了正確製作祭器，由中央分送鑄造的金屬祭器到各地方，來提供樣式用以燒造瓷質祭器，並且嚴格保管與管理祭器。^{⑨4}

朝鮮王室瓷質祭器製作上，以截然不同的材質金屬器的形制作為規範並嚴格管理執行。但是如上述朝鮮王室祭器規範，是基於不同歷代中國禮制相關圖式而建立，這影響了瓷質祭器的樣貌。^{⑨5}以粉青沙器簋（圖18）為例，除了形制上仿金屬器的特徵之外，蓋與器腹飾水波紋、蓋沿與口沿各飾雷文。其裝飾特徵確實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式（圖9）相當接近。但是，簋原為

⑨3 周炅美，〈조선전반기 금속공예의 대중교섭 [朝鮮前半期金屬工藝之對中交涉]〉，《朝鮮前半期美術의 對外交渉 [朝鮮前半期美術之對外交渉]》（首爾：藝耕，2006），頁261；安星稀根據文獻記載，認為朝鮮初因材料不充足，朝鮮王室才開始採用瓷質祭器來代替金屬祭器。根據《世宗實錄》的記載，瓷質祭器的主要使用處是王室俗祭或是地方政府舉行的祭祀。瓷質祭器並不在國家王室所有祭祀中使用，而是在相對重要性低的祭祀中部份使用，宗廟和社稷壇等重要祭祀中，主要仍使用金屬祭器。安星稀，《朝鮮時代陶瓷祭器研究》，頁12-15。

⑨4 「禮曹據各道山川壇廟巡審別監所申條件，磨鍊以啓……各官未知簋豆、簠簋、鐙銅尊壺俎玷爵篚等，祭器之制，妄意造作，未得精潔，宜以奉常寺諸色祭器，分送各道，見樣鑄成又造藏祭器庫，令壇直看守。右條，依所申施行，其鑄器，姑以鎡〔磁〕器燔造。從之。」《世宗實錄》，卷49，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第3冊，頁29。

⑨5 根據相關研究，從太宗至世宗年間，為了貢納用粉青沙器的統一規格製作，中央政府送製作範本「見樣」到地方衙門，使得各地磁器所。製作範本「見樣」有圖畫與實物樣品兩者並存。參見朴敬子，〈공납용 분청사기의 통일된 양식과 제작배경 [貢納用粉青沙器的統一風格與製作背景]〉，《美術史論壇》，27（2008），頁95-121。

中國古代青銅器，《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上簋的圖式，其來源的源頭應該是基於實際器物而畫。然而，筆者推測，金屬材質，以鑄造方式製作的銅器，若紋飾有凹凸立體，僅以平面的圖畫無法完整呈現，而且〈祭器圖說〉已經經過多次傳抄，圖案化、符號化的圖式，紋樣多以簡略的線條來表現。粉青沙器簋器身上裝飾，不僅忠實呈現圖式規範上紋飾，也反映出簡略線條畫的紋飾特徵。但是圖與瓷器為不同媒材，粉青沙器簋上主要利用瓷器的裝飾手法以象嵌方式呈現（圖18-1）。

另外，平面的單一圖像無法完整傳達存在三度空間的器物不同面向的樣貌。如此，視覺資訊不完整欠缺的部分，從平面圖像，轉換為立體器物時，製作者有可能是用自己的理解來填補。《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簋的圖式（圖9），器物的正面與側面描繪完整，但是蓋的頂部被棱遮住，因而無法完整掌握其樣貌，只能看到一部分曲線的裝飾。傳世之今的粉青瓷器簋，大部分器身飾水波紋與口沿飾雷文，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圖式大致相同。但是，蓋頂部上紋飾個別不同，其包括；雷文（圖20-1）、重環紋（圖20-2）、曲線紋（圖20-3）、蓮花紋（圖20-4），甚至不同紋飾匯集在一起。^{⑨6} 粉青瓷器簋也有類同的現象出現，粉青瓷器簋蓋器口沿上飾重環紋，這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簋圖式特徵相近。但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簋（圖1）頂部棱的裝飾模糊，粉青瓷器簋頂部底是用花紋、波浪紋、雷文等不同紋飾。^{⑨7}

除了粉青瓷器之外，朝鮮初期十五世紀《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

⑨6 相關研究認為，韓國湖林博物館藏一批《粉青沙器象嵌水波紋簋》，器與蓋皆完整保留，是過去未有的罕見例子。根據在韓國光州忠孝洞窯址十五世紀前半期地層中，出土類同的粉青沙器象嵌簋的事實，其製作時間推定為十五世紀前半期。請參見尹容伊，〈조선조 분청자제기의 성격과 의의 [朝鮮朝粉青瓷祭器之性質與意義]〉，《粉青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韓國湖林博物館，2010），頁181-182。

⑨7 相關例子可舉韓國湖林博物館藏，推定年代為十五世紀前半期的一批傳世《粉青沙器象嵌花紋簋》。請參見韓國湖林博物館，《粉青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圖版16、圖版17、圖版18、圖版20、圖版21。

(圖21)也被認為是替代金屬祭器而製作的例子。^⑨其器形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圖式(圖22)相近,但是紋飾下端三角紋帶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沒有的,下端有三角紋帶的特徵,與1474年刊行的《國朝五禮序禮》中山壘圖式(圖23)一樣。對於製作年代有不同看法,但大致被認為十五世紀後期的。^⑩此白瓷山壘器身上的紋飾使用不同顏料,大部分以鐵花來裝飾,只有在肩部山型紋使用青花。值得注意的是,山壘肩部上雙耳裝飾。《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國朝五禮儀》兩者山壘圖式中,雙耳皆將連續圓圈類似像繩子的形狀來描繪。白瓷山壘雙耳是條狀的,但是其上用鐵花顏料畫上連續的圓圈,應該是為了忠實呈現圖式上形狀而來的(圖21-1)(圖21-2)。

這種金屬材質使用原則,跟同時代明朝的祭器製作有些不同。根據目前的研究,在明代,國家祭祀大致上使用瓷質祭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禮部擬按照古制來修改祭器名稱,又提出瓷器的材質符合古制的意見,最後受到皇帝准許。在洪武四年(1371)下旨孔廟祭禮中所使用的木質祭器均改用瓷質。陶瓷史的相關研究中,根據傳世品與窯址出土文物以及文獻材料,認為明代國家祭祀所用的祭器應為是以瓷質祭器為主。^⑪

⑨ 根據世宗二十九年(1447)下旨將王室內祠堂文昭殿祭祀用銀器,將白瓷來代替的記錄,相關研究推測該白瓷山壘應該在可能1447年之後製作,而且是王室所使用的祭器。金英媛,《朝鮮時代陶瓷器》(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6),頁91-92。

⑩ 金英媛,《朝鮮時代陶瓷器》(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6),頁95-121;尹傲靖,〈조선15-16세기 청화 백자의 생산과 사용-문헌자료와 요지출토품을 중심으로 [朝鮮15-16世紀青花白瓷的生產與使用-以文獻資料與窯址出土品為中心]〉,《美術史學研究》,250•251(2006),頁351-352。

⑪ 目前尚未明代祭器相關的全面性的研究。但是明代早期可以歸為祭祀用陶瓷祭器的例子,可舉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洪武年間釉下褐彩官用供品楷書銘白釉盞、大明宣德款白釉爵杯以及龍泉楓洞岩窯址永樂朝青瓷爵杯子,傳世品有洪武時期孔雀藍釉〈內部供用〉銘等。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75-79。施靜菲教授在相關研究中,在宋元時期流傳《三禮圖》與《宣和博古圖》兩大系統之外,將明初禮制重建過程中出現,以瓷質器做為祭禮器的系統,稱之為「第三系統」,以做區隔。Ching-fei Shih, "The New Idea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Third System?"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6), pp. 113-121.

透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朝鮮王室為了建立適合自己位階的禮器制度，在圖像與器形、材質等多方面進行考證，一再地深思熟慮的事實。而且朝鮮對禮制持有復古主義理念，認為中國古代制度是最理想的。祭器形式上也以盡量接近為目標，這在朝鮮禮制討論中被稱為「古制」。朝鮮祭器可以說是在具備符合古制形式的目標之下，創造了自成一格的視覺圖像。

至於《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所建立的祭器規範之傳承，因為朝鮮前期的金屬祭器失傳，傳世至今的朝鮮王室祭器，甚少有銘文或記錄。因此正確判定其製作年代，全面掌握其發展情形有困難。但是，朝鮮時代不同時期王室祭器多有相關〈祭器圖說〉傳世，為祭器體系與發展提供寶貴的資訊。^⑩ 朝鮮後期祭器的發展，金終任根據傳世宗廟祭器與〈祭器圖說〉，認為十五世紀建立的規範與風格大致持續到十八世紀前半期，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才開始出現變化。到了十八世紀後半期開始，祭器紋飾形狀直接受到《大明集禮》（成於1370年）的影響。^⑪ 其中，以《社稷署儀軌》（1783）的簠（圖24）為例，《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簠器身與上蓋以水波紋為底的不同，雷文為底其上有兩組交錯的半圓環來裝飾，上蓋也並列花瓣形的圓環來裝飾。紋飾上的特徵與《大明集禮》中宗廟祭器簠相同（圖25）。

朝鮮初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成為典範的事實，在朝鮮後期經過戰爭之後進行的禮器復興過程中相當明顯。朝鮮王朝到了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前半期，經歷了壬辰倭亂（1592—1598）與丙子胡亂（1636—1637）兩次的大戰亂。朝鮮王室宗廟在壬辰倭亂的戰亂中曾被燒失。因在短短五十年之間連續發生的大戰

⑩ 朝鮮時代王室製作的〈祭器圖說〉流傳至今者大約15種，從十五世紀《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以來到十九世紀高宗時期光武年間（1897—1907）持續製作。詳細內容，請參閱河恩美，〈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研究〉，頁100，圖說目錄。

⑪ 金終任認為『宮園儀』（1780）、『社稷署儀軌』、『景慕宮儀軌』（1784）、『春官通考』（1788）中簠，簠，香爐，香盒，匱，匱祭圖像參考了《大明集禮》。詳細內容，請參閱金終任，〈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宗廟祭器을 中心으로 [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美術學研究》，277（2013），頁141-144。表5；《大明集禮》是明朝初年洪武二年（1369）開始編修，在洪武三年（1370）九月修成。《大明集禮》於洪武初官修而未刊印，到嘉靖九年（1530），因考論禮儀所需才訂正刊布。趙克生，〈《大明集禮》的初修與刊佈〉，《史學史研究》，115（2004），頁65-69。

爭，朝鮮國土傷勢慘重，宮室廟宇受到戰火波及有所損壞，摧毀了朝鮮前期所累積下來的文物。^⑩ 戰亂之後朝鮮王室為了禮器重建，設置祭器都監編撰各種禮器製作相關儀軌，其例子可舉；《社稷宗廟文廟祭器都監儀軌》（1605）、《祭器都監儀軌》（1611）、《宗廟樂器都監儀軌》（1624）等。^⑪ 以上儀軌的製作反應當時朝鮮王室對禮器制度重建的努力，而且幫助我們了解當時祭器製作的詳細情形。相關研究根據朝鮮王室在十七世紀相關儀軌中〈祭器圖說〉，指出祭器形式與紋飾方面，沿用朝鮮前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與《國朝五禮儀》祭器體系的事實。^⑫

朝鮮王室不僅傳承朝鮮前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復原祭器體系，值得注意的是，《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建立的，國家重要祭祀用祭器使用金屬材料的原則，在朝鮮王朝祭器製作中持續下去的事實。朝鮮王室在倭亂結束之後，物質缺乏的背景之下，不得不燒造瓷器來充當王室祭祀所需要的祭器，但也清

⑩ 壬辰倭亂期間王室祭祀的中心空間宗廟被燒失，各地祭祀相關空間大部分受嚴重破壞。李煜，《조선 왕실의 제향 공간: 정제와 속제의 변용 [朝鮮王室的祭享空間：正祭與俗祭的變容]》（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部，2015），頁18-21。

⑪ 朝鮮時代在宮廷舉辦所有吉凶禮儀及國家行事的時候，設置主管臨時官司「都監」，都監記錄禮儀或行事的所有過程，將相關記錄成冊做「儀軌」。李成美，《가례도감의궤와 미술사: 왕실 혼례의 기록 [嘉禮都監儀軌與美術史：王室婚禮之紀錄]》（首爾：笑臥堂，2008），頁11-23；朝鮮時代儀軌是王室相關各種儀式的規範。記錄儀禮之始末的一種執行報告，同時成為範本，之後舉辦同樣儀式的時候參考使用。其內容包括負責相關單位官員名單、討論過程、儀式細節步驟、相關部門官署之間互相傳送的文件記錄、相關所用物品之目錄及製作所需品目、負責製作的匠人之名稱、以及對他們的報酬等詳細記錄。其中包含紀錄儀式場面的圖畫或相關物品的繪圖。朝鮮時代儀軌根據文獻記載，太祖時期已經開始編纂儀軌，目前傳世約637件朝鮮時代儀軌，大部分為十七世紀之後者。參見韓永愚，《조선왕조 의궤(儀軌)－국가의례와 그 기록 [朝鮮王朝儀軌－國家儀禮與其記錄]》（首爾：一志社，2005）。

⑫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49-80。

楚認知燒造瓷器違背古制。^{⑩6} 實際上，當時朝鮮王室為了復原禮器制度，倭亂結束之後宣祖三十四年（1601）開始，朝鮮王室陸續鑄造祭器。但是人力與物資缺乏，無法一時完備王室祭祀用的所有祭器，從宗廟與社稷祭祀所用的祭器開始，陸續製作王室陵墓、文廟的祭器。其過程中使用大量的鐵與銅等材料，經數十年時間才逐漸完成。^{⑩7}

傳世祭器中有韓國古宮博物館藏數件「萬曆三十三年（1605）」銘文金屬祭器（圖26）（圖26-1）。其紋飾與形式跟《社稷宗廟文廟祭器都監儀軌》祭器圖說相近，被推測為倭亂之後為了宗廟製作的祭器。^{⑩8} 另外，最近針對宗廟廣場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鳥彝（圖27）（圖27-1）、著尊（圖28）（圖28-1）、簋、山壘等數件金屬祭器。根據相關考古報告，這批祭器發現於十七到十八世紀之間的斷層中。相關報告與研究共同認為器形與紋飾，顯示出繼承朝鮮前期的形式。^{⑩9} 至於這批祭器的正確製作年代待商榷，但是根據鳥彝的紋飾描繪像似鳳凰，跟十七世紀以前祭器圖說中描繪為鳥不同（圖4-1）。描繪成鳳凰的形式最早出現於十七世紀初《祭器都監儀軌》。宗廟出土的鳥彝，從鳥左右展翅的姿態、尾巴有條齒型五條羽毛且翹起來，又鳥頸部後面三個羽毛各有鉤子模樣的小毛，細節描繪與《祭器都監儀軌》鳥彝相似（圖29）。《祭器都監儀

⑩6 「古者，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則不敢以祭，且祭器不備，不造燕器，祭器不備，代以燕器，猶可也，必至於不敢以祭，則其義豈不嚴且重哉？宗廟祭用器皿，專用司饗院沙器，此禮所謂燕器，而古人所不敢以祭之物。揆之古禮，亦極未安。且棗盛一器，元數四升，而磁沙鉢，只用二升，故餘二升，減去不用。燕器本不可以祭，而以器之故，減削棗盛，尤極未安。許多祭器，雖不能一時並舉，簋簠邊豆之屬，先設局，急速造作，而如犧象樽盥盆之類，觀勢隨造宜當。大禮畢後，即時舉行何如？啓依允。」奇自獻等撰，《宣祖實錄》，卷180，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7），第24冊，頁680。

⑩7 張慶姬，〈조선후기王室祭器鑄成鑰器匠 연구〔朝鮮後期王室祭器鑄成鑰器匠研究〕〉，《韓國工藝論叢》，11卷2號（2008），頁3-24。

⑩8 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52-54。該祭器原宗廟管理事務所藏，經本人的調查已經轉移到韓國古宮博物館收藏。銘文刻在足部內兩側，其內容分別為「萬曆三十三年（1605）三月日造」、「蓋具八斤十二兩」。

⑩9 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首爾：首爾歷史博物館，2012），頁470-474；金終任，〈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147-151。

軌》是在光海君三年（1611）為了宗廟及各陵祭器製作的儀軌。根據考古發掘的層位以及形式，推測很可能是戰亂之後為了禮制重建製作的祭器。這些傳世品的例子不多，但是證實了朝鮮王室戰亂之後重建金屬祭器，而且形式上當時朝鮮王室延續朝鮮初期所制定祭器規範的事實。

如上述，朝鮮十七世紀禮制重建過程中，朝鮮初期建立的祭器制度被視為朝鮮禮器傳統，祭器的形式與架構上傳承《世宗實錄》〈祭器圖說〉的典範。雖然禮器制度本身具有保守性，朝鮮王室禮制制度也隨著時代有新的變化與選擇。十八世紀明亡而清朝建立，對朝鮮帶來很大影響，這使王室禮制制度上增加的新的祭祀典禮。為了報答明朝對倭亂時對朝鮮救國之恩，朝鮮王室在昌德宮的後苑，修建了一處祭祀中國明朝皇帝的祭壇「大報壇」，專門祭祀明朝的神宗（1573—1620在位）。^⑩ 肅宗三十年（1704）制定大報壇祭祀規範時，「遵用皇朝之儀」，祭器依《大明集禮》圖式製作。^⑪ 後來，在英祖二十三年（1747）整理肅宗時期（1674—1720在位）大報壇祭祀禮儀製作《皇壇儀》（1747），〈祭器圖說〉採用《大明集禮》宗廟祭器圖式。^⑫ 耐人尋味的

⑩ 關於大報壇之設置與相關祭祀，請參見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第二章〈尊周思明與大報壇崇祀〉。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99-146。

⑪ 「禮曹參判金鎮圭（1658—1716）以皇壇高廣，行祭儀式，稟定於上前。命廣依我國社稷壇，方二十五尺，高從中朝社稷壇五尺，壇陞自地至壇面，通為九級，登歌、軒架，一倣社壇之制，祭物品式，遵用皇朝之儀，祭器依《集禮》圖式，神座黃帳房，依《會典》圖說，八佾等器，則以南、北郊所用，推移用之，行祭儀文，則以《集禮》親王享仁祖之禮，參酌磨鍊。」金昌集等撰，《肅宗實錄》，卷40，收入《朝鮮王朝實錄》（太白山本，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7），第40冊，頁115。

⑫ 韓亨周根據《朝鮮王朝世宗實錄》世宗二十二年（1440）命金何（？—1462）買大明集禮的記載，認為《大明集禮》在世宗朝導入朝鮮，並認為《朝鮮王朝世宗實錄》〈五禮儀〉與《國朝五禮儀》吉禮條的內容，跟《大明集禮》有很多相同之處。參閱韓亨周，《朝鮮初期國家祭禮研究》，頁7。但是，金文植在朝鮮時代國家典禮書之編撰研究中，根據朝鮮光海君元年（1609）明神宗（1572—1620在位）的神位位置跟明使臣論辯時，朝鮮的問禮官李惺（1562—1624）拿《大明集禮》禮儀規定根據的事件等，認為《大明集禮》到了十七世紀正式傳入朝鮮並參考。金文植，〈朝鮮時代國家典禮書的編撰狀況〉，《藏書閣》，第21輯（2009），頁79-104。

⑬ 金終任，〈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頁143-144。表4。

是，同時期朝鮮王室宗廟祭祀而編撰的《國朝喪禮補編》（1758）中〈祭器圖說〉，是沿用朝鮮初期所建立的規範。^⑪如著尊為例，《皇壇儀》與《大明集禮》中祀天祭器一樣，器身上沒有任何紋飾（圖30）、（圖31），《國朝喪禮補編》的著尊（圖32）器身肩部與腹部設三段裝飾帶，腹部以波浪紋裝飾，器身下端圓錐形的裝飾等，其紋飾與《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著尊圖式（圖33），以及宗廟出土著尊（圖28）相近。朝鮮初期制定的祭器規範，雖然來自中國不同時代的祭器圖像組合而成，但是由此可見這套祭器規範成為朝鮮自我傳統與典範，朝鮮祭器製作上固守傳承。而且，不同祭器系統的使用，顯示著朝鮮自己與他者之間的區隔與分別。

目前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收藏朝鮮宗廟、各地王室陵墓所留下來的祭器，其中金屬製祭器大約九千多件。^⑫雖然我們無法完整回溯朝鮮初期的祭器實際樣貌，但是從傳世龐大數量的金屬祭器中，可以見證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中樹立的典範，在朝鮮王室的祭器中被傳承的事實（圖34）、（圖35）。

結語

綜上所述，收錄於《世宗實錄》的〈祭器圖說〉，涵蓋了各種中國歷代祭器圖像，其內容與朝鮮初期禮制制定過程有密切相關。當時朝鮮為獨立國家，在禮制秩序上符合一個國家位階與需求的祭器制度之樹立是當面課題。明朝與朝鮮建立時間相近，有密切的交流關係。朝鮮抱持著文化國的驕傲，在儒家禮制位階秩序上自認為天子國之下的諸侯國禮制是適合他們的。但是，明朝對禮制不干涉的基本態度，影響了朝鮮以自認為儒家國家最理想的禮制為古制的方向來進行禮制制定。

為了符合儒教政治理想的祭器規範之建立，參考了多種中國禮書與祭器圖像之後，朝鮮按照諸侯國禮制的需要，從不同歷史傳統的祭器圖像中選擇並

^⑪ 目前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和首爾宗廟所藏的朝鮮時代銅質祭器中，祭祀中在祭床與尊所床所陳設的祭器總數量約9,274件。參見金終任，《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頁104-105。

建立了自己的禮器體制。尤其，許稠撰寫的《世宗實錄》「吉禮」的〈祭器圖說〉中，多數包含朱熹《釋奠儀式》圖像，這原因可以說是包括許稠等朝鮮初禮制制定者，在古制的追求上把朱熹的復古主義放在中心的結果。這樣的價值觀帶來對於呼應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金屬材質的重視，直接影響朝鮮初期禮制藝術的創作。以傳世朝鮮初期瓷質祭器為例，其作為金屬材質祭器的替代品，由於材質截然不同，但忠實模仿金屬器的圖像，因而產生特別的瓷器風格。

雖然朝鮮初期的視覺資料不足，但《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展現出朝鮮初期禮制藝術的美學層面。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看見朝鮮為了儒教理想國家之實現，不斷地考證中國古代的制度，並以相應於此的制度樹立為目標。理念實踐的一環，在祭器上面也呈現出追求反映古代器物圖像的復古主義風格。〈祭器圖說〉以不同傳統與脈絡的中國祭器圖像為源頭，但其組合可謂是十五世紀朝鮮對禮器的知識，與對古代的印象和追求結合而產生的理想視覺再現。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在東亞祭器圖像成為美術文化的共同現象的脈絡中，具有再創造與發展的意義。尤其是跟同時代明朝的國家祭祀中建立以瓷質祭器為中心的體制，或日本江戶時代湯島聖堂文廟祭祀中所使用的日本漆器祭器（圖36）擺在一起的時候顯得更為突出。朝鮮初期《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建立的禮器規範，在朝鮮時代一直延續下去。傳世至今的朝鮮時代不同時期王室祭器製作相關的〈祭器圖說〉中可見其傳承。尤其，在朝鮮後期經過戰爭之後進行的禮器復興過程中，不僅繼承朝鮮前期所建立的祭器規範復原祭器體系，也堅守《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建立的使用金屬材料的原則。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見《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在韓國禮制藝術上的創新而成為一個典範的事實。實際上《世宗實錄》〈祭器圖說〉所制定的規範的影響與其迴響之餘波，在目前宗廟祭禮中使用的祭器上仍然可以看見（圖37）。^⑪

（責任編輯：陳卉秀）

⑪ 韓國宗廟祭禮每年在五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天舉行。2001年，宗廟祭禮和宗廟祭禮樂被列入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ESCO）「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宗廟祭禮》，頁24-28。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朱熹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阮逸、胡瑗

《皇祐新樂圖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不著編人

《洪武禮制》，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刊本。

徐一夔

《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9、6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陳元靚

《事林廣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建安椿莊書院刊本。

陳祥道

《禮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禮書》，據元至正七年福州路儒學刻明修本影印，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經部，第3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朝鮮王朝實錄》，據太白山本影印，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7。

鄭玄註、陸德明釋文

《纂圖互註周禮》，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21，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衛宏撰

《大唐開元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聶崇義

《新定三禮圖》，據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刻本影印，收入《古逸叢書》，三編，第40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申叔舟 (朝鮮) 等編

《國朝五禮序例》，朝鮮成宗五年 (1474) 木刻本 (奎184～奎186、奎2277、奎11970)。

編者未詳

《社稷宗廟文廟祭器圖監儀軌》，朝鮮宣祖三十八年 (1605) 抄本 (奎14930)。

議政府 (朝鮮) 編

《祭器圖監儀軌》，朝鮮光海君三年 (1611) 抄本 (奎14931)。

議政府 (朝鮮) 編

《祭器樂器都監儀軌》，朝鮮仁祖二年 (1624) 本影印，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2。

徐文重等纂

《宗廟儀軌》，朝鮮肅宗三十二年 (1706) 本影印，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金在魯等奉教編

《國朝喪禮補編》，朝鮮英祖三十四年 (1758) 印本 (奎3940)。

編者未詳

《社稷署儀軌》，朝鮮正祖七年 (1783) 抄本影印，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編者未詳

《皇壇儀》，朝鮮英祖二十四年 (1748) 印本 (奎14308-v.1-2)。

編者未詳

《景慕宮儀軌》，朝鮮正祖年間 (1776-1800) 抄本影印，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6。

柳義養編

《春官通考》，朝鮮正祖十二年 (1788) 抄本影印，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6。

近人論著

(一) 中文著作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2014 《魯荒王墓》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n Dong Museum and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s.

2014 *Luhuangwang mu* (Tomb of Prince Huang of Lu), Part 1 & 2,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王宇清

1966 《冕服服章之研究》，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Wang, Yu-qing

1966 *Mianfu fuzhang zhi yanjiu* (Research on Mianfu Clothing), Taipei: Zhonghua congshu bianshen weiyuanhui (Editorial and Review Board for Chinese Series Books).

王光堯

2010 《明代宮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Wang, Guang-yao

2010 *Mingdai gongting taocishi* (Ming Dynasty Court Ceramic History),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余英時

2003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社。

Yu, Ying-shi

2003 *Zhu Xi de lishi shijie: Songdai shidafu zhengzhi wenhua de yanjiu* (The Historical World of Zhu Xi: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Song-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Taipei: Asian Culture.

昌彼得等

1974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

Chang, Pi-de etc.

1974 *Songren zhuanji ziliao suoyin* (Index to Biographical Materials of Sung Figures), Taipei: Ting Wen Co. Ltd.

金忠烈

1992 《高麗儒學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Jin, Zhong-lie

1992 *Gaoli ruxue sixiang shi* (Goryeo History of Confucianism), Taipei: Dongda Books.

孫致文

2003 〈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Sun, Chih-wen

2003 “Zhu Xi Yili jingchuan tongjie yanjiu (Research on Zhu Xi’s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of the Canon and Commentaries of Ceremonies and Rites*),” Zhongli: PhD Diss.,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孫衛國

2007 《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

Sun, Wei-guo

2007 *Daming qihao yu xiaozhonghua yishi: Chaoxian wangchao zun Zhou si Ming wenti yanjiu* (The Flag of Great Ming and Little Sinocentrism thought: A Study of Issue in Reserve the Zhou And Commemorate the Ming in Joseon Dynasty, 1637-180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許雅惠

2003 〈《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4期，頁1-26。

- 2012 〈宋代復古銅器風之域外傳播初探—以十二至十五世紀的韓國為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32期, 頁103-170。

Hsu, Ya-hwei

- 2003 “The “Indirect” Transmission of the Hsüan-ho po-ku-t’u Earthenware from the Tomb of Sai-yin Ch’ih-ta-hu and the Shao-hsi chou-hsien shih-tien i-t’u,”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14, pp. 1-26.
- 2012 “Revival of Antiquity Outside China?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rchaistic Style’ in Sino-Korean Artifacts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32, pp. 103-170.

馬曉光

- 2005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Ma, Yao-guang

- 2005 *Zhongguo lishi diming dacidian* (Dictionary of Geographical Name in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陳芳妹

- 2005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 23卷, 1期, 頁267-332。
- 2011 〈與三代同風: 朱熹對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初探〉,《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31期, 頁61-150。

Chen, Fang-mei

- 2005 “Seeking the Three Dynasties among the Ritual Vessels of Old: The Sung Dynasty Move from ‘Investigating Antiquity’ to ‘Appreciating Antiquit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3, no. 1, pp. 267-332.
- 2011 “Sharing the Moralizing Influence of the Three Dynasties: Zhu Xi’s Shaping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mager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31, pp. 61-150.

張偉

- 2006 〈明代靖江王研究〉, 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Zhang Wei

- 2006 “Mingdai jingjiangwang yanjiu (A Study on King Jingjiang of Ming Dynasty),” Master’s Thesi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張德信

- 1985 〈明代諸王分封制度述論〉,《歷史研究》, 177, 頁76-91。

Zhang, De-xin

- 1985 “Mingdai zhuwang fenfengzhidu shulun (A Review on the Enfeoffment System of Kings in th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 Research*, no. 177, pp. 76-91.

趙克生

2004 〈《大明集禮》的初修與刊佈〉，《史學史研究》，115期，頁65-69。

Zhao, Ke-sheng

2004 “The First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Daming Jili*,”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 no. 115, pp. 65-69.

謝明良

2002 〈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頁143-168。

2006 〈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故宮文物月刊》，279期，頁68-83。

Hsieh, Ming-liang

2002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gionalism in Northern Funerary Earthenware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Evidence of the Wang Shih-hsien Clan Tombs of Chang Count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19, no. 4, pp. 143-168.

2006 “Ji gongling aihuanghou chutu de taoqi(Note on Potteries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Empress Ai in Gong Imperial Mausoleum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279, pp. 68-83.

(二) 日文著作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2008 《天にささげる器-朝鮮時代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2008 *Ten ni sasageru utsuwa : chōsen jidai no saiki* (Ritual Vesse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西山松之助監修

2001 《湯島聖堂と江戸時代》，東京：財團法人斯文會。

Nishiyama, Matsunosuke ed.

2001 *Yushima Seidō to Edo jidai* (Yushima Seidō and Edo Period), Tōkyō: Shibunkai.

野村恵子

1988 〈李朝陶磁における祭器の變遷〉，《企劃展朝鮮陶磁シリーズ11-李朝の祭器》，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頁14-15。

Nomura, Keiko

1988 “Richō tōji ni okeru saiki no bensen,” *Chōsen tōji sirizu 11- Richō no saiki* (Exhibition of Joseon Ceramic Series 11 - Ritual Vesse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Osaka: The Museum of Oriental Ceramics, pp. 14-15.

東京国立博物館

1991 《釈奠器：湯島聖堂伝来》，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

Tokyo National Museum

- 1991 *Sekitenki Yushima Seidō denrai* (Confucian Ritual Implements: Formerly Used at Yushima Seidō Confucian Shrine).

(三) 韓文著作

申千湜

- 2004 《麗末鮮初 性理學의 受容과 學脈 [麗末鮮初性理學之受容與學脈]》，首爾：景仁文化社。

Sin, Cheon-sik

- 2004 *Ryeomal seoncho seonglihak ui suyong gwa hakmaek* (Acceptance of Neo-Confucianism and Scholarly Lineage in Late Koryeo and Early Joseon), Seoul: Gyeong-in munhwasa.

安琉鏡

- 2010 〈《國朝五禮儀》와 그 속보 (續補) 편의 편찬과정 및 내용 [《國朝五禮儀》和其續補編制編撰過程及內容]〉,《儒教文化研究》,第16輯,頁63-96。

An, Yu-gyeong

- 2010 “Gukjo-orye-ui wa geu sokbo pyeon ui pyeonchan gwajeong mit naeyong (Regarding Compilation Process and Content of Five Rites of the State and the Sequel Volumes),” *Journal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vol. 16, pp. 63-96.

尹微靖

- 2006 〈조선 15-16세기 청화 백자의생산과 사용-문헌자료와 요지출토품을 중심으로 [朝鮮15-16世紀青花白瓷的生產與使用-以文獻資料與窯址出土品為中心]〉,《美術史學研究》,250•251,頁315-360.

Yoon, Hyo-jeong

- 2006 “Joseon 15-16segi cheonghwa baekja ui saengsan gwa sayong-munheon jaryo wa yojichultopum eul jungsim euro (The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s of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Joseon Dynasty),” *Misulsahak yeongu*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50•251, pp. 315-360.

尹容伊

- 2010 〈조선조 분청자재기의 성격과 의의 [朝鮮朝粉靑瓷祭器之性質與意義]〉,《粉靑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湖林博物館,頁180-192。

Yun, Yong-i

- 2010 “Joseonjo buncheongjajegi ui seonggyeok gwa uiui (The Characteristic and Significance of Buncheong Ware Ritual Vesse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Buncheong Ware Ritual Vessels*, Seoul: Horim Museum, pp. 180-192.

安星稀

- 2005 〈朝鮮時代 陶瓷祭器 研究〉,韓國梨花女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Ahn, Sung-hee

- 2005 “Joseon sidae doajajegi yeongu (A Study on Ceramic Ritual Vessels of Joseon Period),”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Ewha Womans University.

朴元煥

- 2002 《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

Bak, Won-ho

- 2002 *Myeongcho Joseon gwangyesa yeongu* (A Study of Early Ming Relations with Joseon), Seoul: Iljogak.

朴敬子

- 2008 〈공납용 분청사기의 통일된 양식과 제작배경〔貢納用粉靑沙器的統一風格與製作背景〕〉，《美術史論壇》，27，頁95-121。

Bak, Gyeong-ja

- 2008 “Unified Style of the 15th Century Korean Buncheong Ceramics and the Uniform Manufacturing Background,” *Art History Forum*, 27, pp. 95-121.

朴秀晶（音譯）

- 2012 〈조선초기 의례（儀禮）제정과 희준（犧尊）・상준（象尊）의 역사적 의미〔朝鮮初期儀禮制定與犧尊・象尊的歷史意義〕〉，《朝鮮時代史學報》，60，頁5-35。

Pak, Su-jeong

- 2012 “The Ritual Enactments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and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Huijun•Sangjun,” *The Journal of Choson Dynasty History*, no. 60, pp. 5-35.

江文植

- 2008 〈태종～세종대 許稠의 禮制정비와 禮인식〔太宗～世宗時期許稠的禮制整頓和禮意識〕〉，《震壇學報》，105，頁111-139。

Gang, Mun-sik

- 2008 “Taejong-Sejongdae Heo Jo eui yeoje jeongbi wa ye insik (A Study on Heo Jo's Role in Making Rite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Ye during Taejong's to Sejong's regains),” *The Chin-Tan Hakbo*, vol. 105, pp. 111-139.

全惠淑（音譯）、劉在韻（音譯）

- 2006 〈조선 태종대 관복제정에 관한 연구〔朝鮮太宗朝冠服制定相關研究〕〉，《服飾》，第56卷7號，頁69-78。

Jeon, Hye-suk and Ryu, Jae-un

- 2006 “Joseon Taejong dae gwanbok jejeong e gwanhan yeongu (A Study on the Settlement of Official Uniform under the Reign of King Taejong in the Early Joseon),” *Journal of the Korean Society of Costume*, vol. 56, no.7, pp. 69-78.

池斗煥

- 1985 〈國朝五禮儀 편찬過程 I ; 吉禮 宗廟・社稷祭儀를 中心으로 〔國朝五禮儀編纂過程 I ; 以吉禮宗廟・社稷祭儀為中心〕〉,《釜山史學》, 第9輯, 頁145-180。
- 1994 《朝鮮前期禮儀研究－性理學 正統論을 中心으로 〔朝鮮前期禮儀研究－以性理學正統論為中心〕》, 首爾: 首爾大學出版部。
- 2010 〈朝鮮前期國家儀禮〉,《분청사기제기: 하늘을 땅으로 부른 그릇 〔粉靑沙器祭器: 召喚天到地的容器〕》, 首爾: 湖林博物館, 頁192-203。

Ji, Du-hwan

- 1985 “Gukjo-o-rye-ui pyeonchan gwajeong I: Gilrye, Jongmyo, Sajjik je-ui reul jungsim euro (Book on the Five Rites of State; Focusing on Ancestral Worship Rites, Ritual of Sacrifice to Royal Ancestral Shrine and Spirits of the Earth and Grain),” *Busan Sahak*, vol. 9, pp. 145-180.
- 1994 *Joseon jeongi ye-i yeongu-seongrihak jeongtongron eul jungsim uiro* (The Study of Rites in Early Joseon: Concerning Neo-Confucianism Legitimacy), Seoul: Seoul Daehakkyo chulpanbu.
- 2010 “Joseon jeongi gukga uirye (National Rites in Early Joseon),” *Buncheongsagijegi: haneul eul ttang euro bureun geureut* (Buncheong Ware Ritual Vessels), Seoul: Horim Museum, pp. 192-203.

李存熙

- 1977 〈朝鮮前期의 對明 書冊貿易－輸入面을 中心으로 〔朝鮮前期의 對明書冊貿易－以輸入面為中心〕〉,《震檀學報》, 44, 頁53-78。

Yi, Jon-hui

- 1977 “Joseon jeongi ui daemyeong seochaek muyeok: su-ipmyeon eul jungsim euro (Book Trade with Ming China in Early Joseon: Concerning the Imports),” *The Chin-Tan Hakbo*, vol. 44, pp. 53-78.

李迎春

- 2002 〈朝鮮後期の 祀典의 再編과 國家祭祀 〔朝鮮後期祀典的再編與國家祭祀〕〉,《韓國史研究》, 118, 頁195-219。

Yi, Yeong-chun

- 2002 “Joseon hugi ui sajeon ui jaepyeon gwa gukga jesa (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itual Code and the National Memorial Rites of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no. 118, pp. 195-219.

李煜

- 2015 《조선 왕실의 제향 공간: 정제와 속제의 변용 〔朝鮮王室的祭享空間: 正祭與俗祭的變容〕》, 城南: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出版部。

Yi, Uk

- 2015 *Joseon wangsil ui jehyang gonggan: jeongje wa sokje ui byeon-yong* (The Ritual Ceremonies Spaces of Joseon Court: Transformation of Official and Seasonal Ancestral Rites), Seongnam: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Press.

李範稷

- 1991 《韓國 中世 禮思想 研究—五禮言 中心으로 [韓國中世禮思想研究—以五禮為中心]》, 首爾: 一潮閣。

Yi, Beom-jik

- 1991 *Hanguk jungse yesasang yeongu: O-rye reul jungsim uiro* (A Study of Ritual Thought of Middle Ages in Korea: Focoucing on Five Rites), Seoul: Iljogak.

周炅美

- 2006 〈조선 전반기 금속공예의 대중교섭 [朝鮮前半期金屬工藝之對中交涉]〉, 《朝鮮前半期美術의 對外交渉 [朝鮮前半期美術之對外交渉]》, 首爾: 藝耕, 頁243-273。

Ju, Gyeong-mi

- 2006 “Joseon jeonbangi gumsok gongye ui daejung gyoseop (Chinese Relation of Metal Art in Early Joseon),” *Joseon jeonbangi misul ui dae-oe gyoseop* (Foreign Relations in Early Joseon Art), Seoul: Yegyeong, pp. 243-273.

河恩美

- 2010 〈宗廟祭器와 朝鮮時代 祭器圖說研究 [宗廟祭器與朝鮮時代祭器圖說]〉, 韓國高麗大學文化財學協同課程美術史學專攻碩士論文。

Ha, Eun-mi

- 2010 “A Study on the Ritual Vessels in Jongmyo and Diagrams and Explanations for Ritual Vesse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Studies, Korea University.

金文植

- 2009 〈조선시대 國家典禮書의 편찬 양상 [朝鮮時代國家典禮書的編撰狀況]〉, 《藏書閣》, 第21輯, 頁79-104。

Kim, Mun-sik

- 2009 “Joseon sidae gukgajeonryeseo ui pyenchan yangsang (The Trends of Editing National Rituals in Joseon Dynasty),” *Journal of Jangseogak Archives*, no. 21, pp. 79-104.

金英媛

- 2006 《조선시대 도자기 [朝鮮時代陶瓷器]》, 首爾: 首爾大學校出版部。

Kim, Yeong-won

- 2006 *Joseon sidae dojagi* (Joseon-period Ceramics),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金紅男

- 1999 〈朝鮮時代宮牡丹屏研究〉, 《美術史論壇》, 9, 頁63-107。

Kim, Hong-nam

1999 “Joseon sidae gungmoranbyeong yeongu,” *Art History Forum*, 9, pp. 63-107.

金海榮

2003 《朝鮮前期祭祀典禮研究》，首爾：集文堂。

2010 〈조선초기 禮制 연구와 《國朝五禮儀》의 편찬 [朝鮮初期禮制研究和《國朝五禮儀》之編纂]〉,《朝鮮時代學報》, 55, 頁57-60。

Kim, Hae-young

2003 *Joseon jeongi jesa jeonrye yeongu* (Confucian Sacrificial Rites in Early Joseon Dynasty), Seoul: Jipmundang.

2010 Joseon chogi yeongu wa gukjo-o-rye-ui ui pyeon chan (The Study on the Ritual Systems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And the Compilation of National Five Rites), *The Journal of Choson Dynasty History*, no. 55, pp. 57-60.

金終任

2009 〈朝鮮時代 王室 金屬祭器 研究：宗廟祭器를 中心으로 [朝鮮時代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 韓國東國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3 〈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宗廟祭器를 中心으로 [朝鮮王室金屬祭器研究－以宗廟祭器為中心]〉,《美術學研究》, 277, 頁133-165。

Kim, Jong-im

2009 “Joseon sidae wangsil gumsok jegi yeongu: jongmyo jegi reul jungsim euro (A Study of Metal Ritual Vessels in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Joseon Dynasty-On the basis of the Ritual Vessels in Jongmyo Shrin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Dongguk University.

2013 “Joseon wangsil gumsok jegi yeongu-Focusing on the Ritual Vessels at the Jongmyo Shrine (A Study of Metal Ritual Vessels of the Joseon Court - Focused on the Ritual Vessels at the Jongmyo Shrine),”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77, pp. 133-165.

金澈雄

2003 〈조선초기 祀典의 체계화 과정 [朝鮮初期祀典之體系化過程]〉,《文化史學》, 20期, 頁79-104。

Kim, Cheol-ung

2003 “Joseon chogi sajeon ui chegyehwa gwajeong (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Ritual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Journal of Korean Cultural History*, no. 20, pp. 79-104.

姜敬淑

2000 《한국 도자기의 연구 [韓國陶磁器的研究]》, 首爾：Sigongsa。

Gang, Gyeong-suk

2000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orean Ceramics*, Seoul: Sigongsa.

宮中遺物展示館

2004 《宗廟大祭文物》，首爾：宮中遺物展示館。

Gungjung yumul jeonsiguan (The Royal Museum)

2004 *Jongmyo daeje munmul* (The Relics of Jongmyo Jerye), Seoul: The Royal Museum.

首爾歷史博物館編

2012 《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首爾：首爾歷史博物館。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2012 *Jongmyo guangjang balgul josa boguseo*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Jongmyo Square), Seoul: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崔公鎬

1992 〈朝鮮初期의 工藝政策과 그 理念〔朝鮮初期工藝政策與其理念〕〉，《美術史學研究》，194/195，頁77-88。

Choe, Gong-ho

1992 “Joseon chogi ui gongye jeongchak gwa gui i-nyeom (The Policy on Craft Art and Its Concept in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194/195, pp. 77-88.

崔承熙

1966 〈集賢殿研究〉上，《歷史學報》，32，頁1-58。

Choe, Sung-hui

1966 “Jiphyeon jeon yeongu (A Study of Jiphyeon jeon),” *The Kore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2, pp. 1-58.

崔順權

2004 〈宗廟祭器考〉，《宗廟大祭文物》，首爾：宮中遺物展示館，頁156-178。

Choe, Sun-gwon

2004 “Jongmyo jegi go (A Study of Jongmyo Ritual Vessels),” *Jongmyo jerye munmul* (The Relics of Jongmyo Jerye), Seoul: The Royal Museum, pp. 156-178.

裴賢淑

2002 《朝鮮實錄研究序說》，大邱：圖書出版太一社。

Bae, Hyeon-suk

2002 *Joseon sillok yeongu seoseol* (A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n Annals of Joseon Dynasty), Daegu: Doseochulpan Tae-ilsa.

湖林博物館

2010 《분청사기제기 : 하늘을 땅으로 부른 그릇〔粉靑沙器祭器：召喚天到地的容器〕》，首爾：湖林博物館。

Horim Museum

2010 *Buncheongsagijegi: haneul eul ttang euro bureun geureut* (Buncheong Ware Ritual Vessels), Seoul: Horim Museum.

鄭東薰 (音譯)

- 2012 〈명대의 예제 질서에서 조선국왕의 위상 [明代禮制秩序上朝鮮國王的位階]〉, 《역사와 현실 [歷史與現實]》, 84期, 頁251-292。

Jeong, Dong-hun

- 2012 “Myeongdae ui yeje jilseo eseo Joseon gukwang ui wisang (The Status of the Joseon King in the Ming Dynasty Ritual System),” *Quarterly Review of Korean History*, no. 84, pp. 251-292.

鄭素羅 (音譯)

- 1999 〈朝鮮前期 吉禮用 粉靑祭器 研究〉, 《美術史學研究》, 223, 頁5-33。

Jeong, So-ra

- 1999 “Joseon jeongi gilrye-yong buncheong jegi yeongu (A Study on Puncheong Vessels Used on *Gilry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Joseon Dynasty: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Finds from *Chunghyo-dong* Kiln Site),” *Korean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223, pp. 5-33.

韓永愚

- 2005 《조선왕조의례 : 국가의례와 그 기록 [朝鮮王朝儀軌 : 國家儀禮與其記錄]》, 首爾 : 一志社。

Han, Yeong-u

- 2005 *Joseon wangjo uigwe: gukga uirye wa geu girok* (Royal Protocols of the Joseon Dynasty: National Ceremonies and its Records), Seoul: Iljisa.

韓亨周

- 2002 《朝鮮初期 國家祭禮 研究》, 首爾 : 一潮閣。
2004 〈15세기 祀典體制의 성립과 그 추이 : 《國朝五禮儀》 편찬과정을 중심으로 [15世紀祀典體制之成立與其趨勢 : 以《國朝五禮儀》編撰過程為中心]〉, 《歷史教育》, 第89輯, 頁127-161。
2006 〈許稠와 태종~세종대 國家儀禮의 정비 [許稠與太宗~世宗時期國家儀禮之整頓]〉, 《民族文化研究》, 第44號, 頁271-321。

Han, Hyung-ju

- 2002 *Joseon chogi gukga jerye yeongu*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Sacrificial Rites in Early Joseon Dynasty), Seoul: Iljogak.
2004 “15segi sajeon cheje ui seongrip gwa geu chu-i: gukjo-o-rye-i pyeonchan gwajeng eul jungsim euro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15th Centurial ‘Sacrificial Rituals Code’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Five Rites of the State),” *The Korean History Education Review*, no. 89, pp. 127-161.
2006 “Heo Jo wa Taejong-Sejong dae gukga uirye ui jeongbi (Heo Jo’s Role in Establishing Joseon’s State Ritual Protocols from Taejong’s Reign to Sejong’s),” *Korean Cultural Studies*, no. 44, pp. 271-321.

韓國國立文化財研究所

2008 《宗廟祭禮》，首爾：民俗園。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2008 *Jongmyo Jerye* (Royal Ancestral Shrine Ritual), Seoul: Minsokwon.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2016 《흙으로 빚은 조선의 제기 [以泥土塑造的朝鮮祭器]》，首爾：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2016 *Heuk euro bijeun jegi* (Ritual Porcelains of Joseon Dynasty), Seoul: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

2014 《宗廟》，首爾：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Korea

2014 *Jongmyo* (Royal Ancestral Shrine), Seoul: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Korea.

(四) 英文著作

Clunas, Craig

2013 *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London: Reaktion.

Clunas, Craig and Jessica Harrison-Hall

2014 *The BP exhibition 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ovine, Robert C.

1980 “Chinese Ritual Music in Korea: the Origins, Codification, and Cultural Role of Aak,” *Korea Journal*, pp. 16-25.

1988 *Essays on Sino-Korean Musicology: Early Sources for Korean Ritual Music*, Seoul: IL JI SA.

Shih, Ching-fei

2016 “The New Idea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 Third System?”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pp. 113-121.

Yang Xiao-neng

2006 “Ming Art and Culture from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Part 1: Royal and Elite Tombs,” *Orientalism*, vol. 31, no. 5 (2006.6), pp. 40-43.

網路資料庫

朝鮮王朝實錄網路資料庫 <http://sillok.history.go.kr/>

奎章閣原文資料檢索系統 http://e-kyujanggak.snu.ac.kr/LANG/en/search/1_search_main.jsp

圖版出處

- 圖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0。
- 圖2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饌實圖〉，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91。
- 圖3-1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壘圖〉春夏陳設，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92。
- 圖3-2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壘圖〉秋冬及臘日，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92。
- 圖4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雞彝、斚彝、鳥彝、黃彝，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3。
- 圖4-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鳥彝，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3。
- 圖5 〈籩豆簠登爵之圖〉，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1，頁24。
- 圖6 〈六尊圖〉，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1，頁17。
- 圖7 〈尊壘圖〉，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1，頁18。
- 圖8 簠，鄭玄註、陸德明釋文，《纂圖互註周禮》，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1，頁24。
- 圖9 簠，《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180。
- 圖10 《世宗實錄》〈冠冕圖〉，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222。
- 圖10-1 《世宗實錄》〈冠冕圖〉，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第5冊，頁222。
- 圖11 九旒冠，十四世紀後期，明魯荒王朱壇（1370—1389）墓出土，山東博物館藏。
- 圖12 祭器圖，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元原石拓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 圖12-1 壺尊，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牲幣器服圖〉元原石拓本（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 圖13 朱熹，《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出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8冊，頁19。
- 圖14 壺尊，《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5冊，頁184。

- 圖15 造禮器尺，《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5冊，頁178。
- 圖16 粉青沙器象尊，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17 粉青沙器象尊，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18 粉青沙器簋，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18-1 粉青沙器簋（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19 粉青沙器簋，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20-1 粉青沙器簋（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20-2 粉青沙器簋（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20-3 粉青沙器簋（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20-4 粉青沙器簋（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 圖2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壘，朝鮮15世紀，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 圖21-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壘（側面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 圖21-2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壘（側面局部），朝鮮15世紀，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 圖22 山壘，《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第5冊，頁185。
- 圖23 山壘，《國朝五禮序例》，朝鮮成宗五年（1474）木刻本，冊1，頁103，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 圖24 簋，《社稷署儀軌》（1783），冊1，頁013b，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 圖25 簋，《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9冊，頁183。
- 圖26 簋，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 圖26-1 簋（局部），「萬曆三十三年三月日造」銘文，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 圖27 鳥彝，朝鮮，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 圖27-1 鳥彝線描圖，取自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頁375。
- 圖28 著尊，朝鮮，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 圖28-1 著尊線描圖，朝鮮，取自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頁373。
- 圖29 鳥彝，《祭器都監儀軌》（1611），冊1，頁089a，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 圖30 著尊，《皇壇儀》（1747），冊1，頁46，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 圖31 著尊，《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9冊，頁107。
- 圖32 著尊，《國朝喪禮補編》（1758），冊6，頁147，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 圖33 著尊，《世宗實錄》〈祭器圖說〉，出自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世宗實錄》卷128，頁184。

圖34 黃銅簠，朝鮮，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35 黃銅簠，朝鮮，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36 湯島聖堂釋奠器，黑漆簠、豆、簋、俎，江戸時代，18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37 宗廟大祭，出自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宗廟》，頁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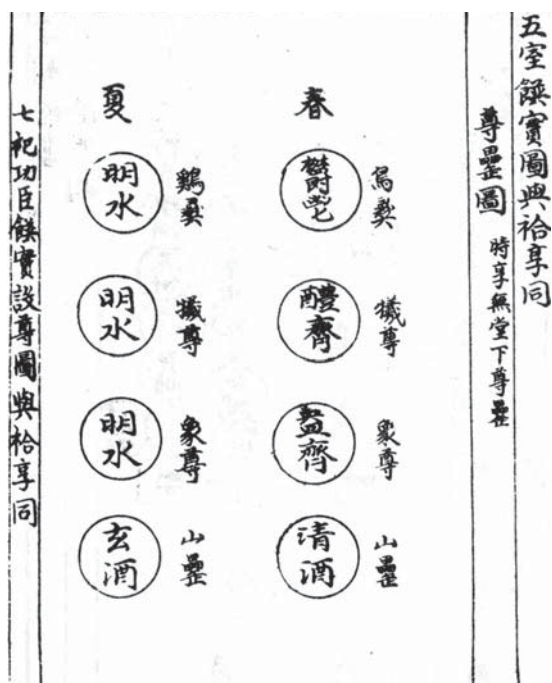


圖3-1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罍圖〉春夏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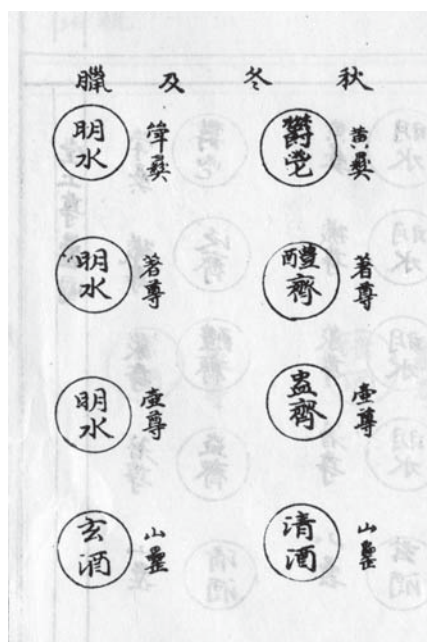


圖3-2 《世宗實錄》〈宗廟五室尊罍圖〉秋冬及臘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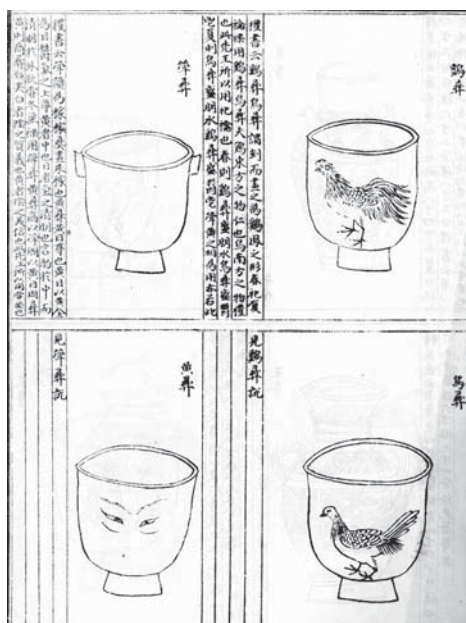


圖4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雞彝、罍彝、鳥彝、黃彝



圖4-1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鳥彝



圖5 〈簠豆簋簋登爵之圖〉《纂圖互註周禮》



圖6 〈六尊圖〉《纂圖互註周禮》



圖7 〈尊罍圖〉《纂圖互註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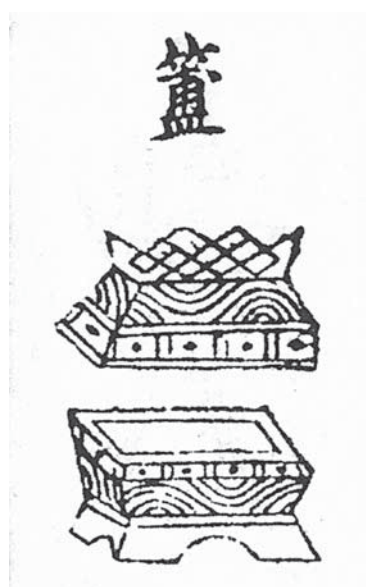


圖8 簠 《纂圖互註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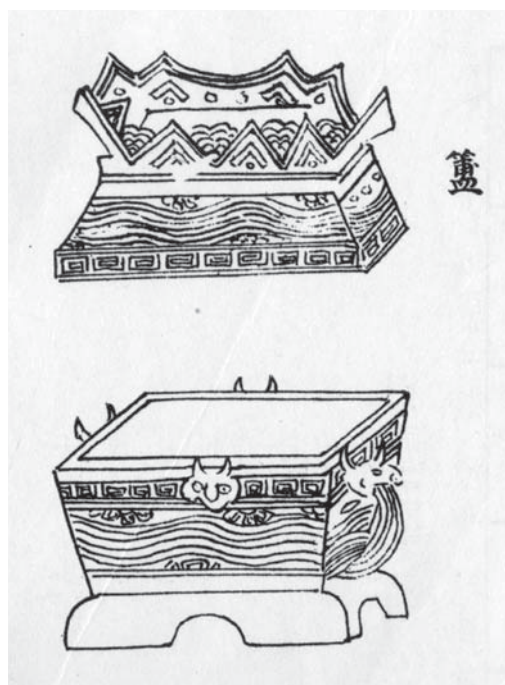


圖9 簠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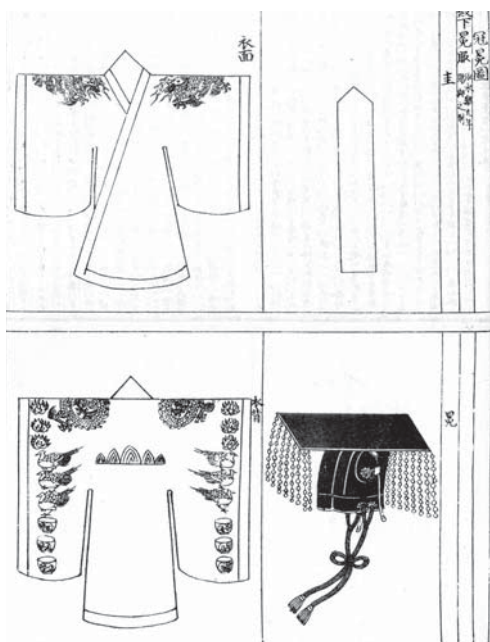


圖10 《世宗實錄》〈冠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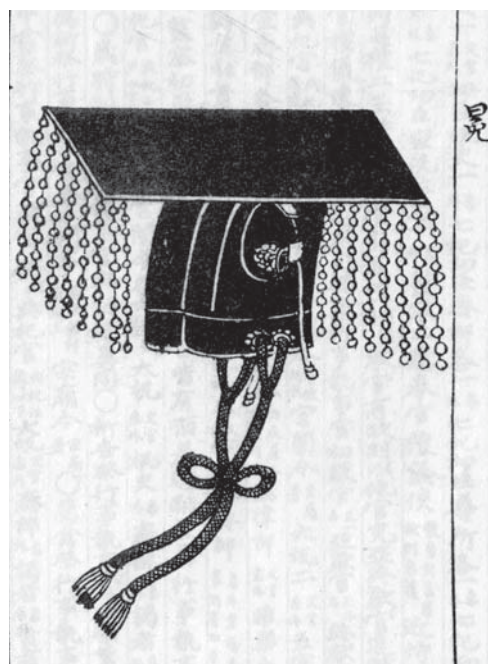


圖10-1 《世宗實錄》〈冠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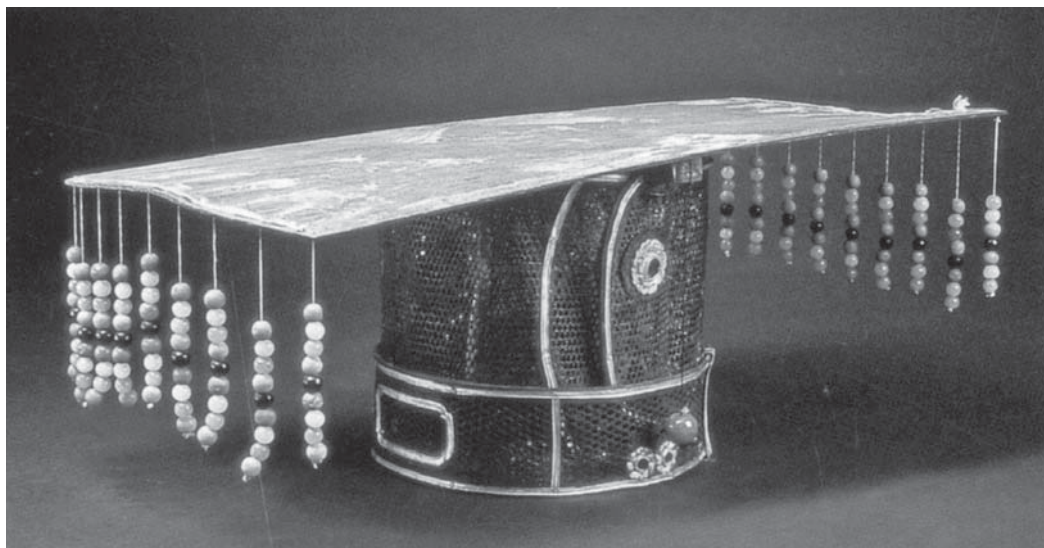


圖11 九旒冠 十四世紀後期 明魯荒王朱壇（1370-1389）墓出土 山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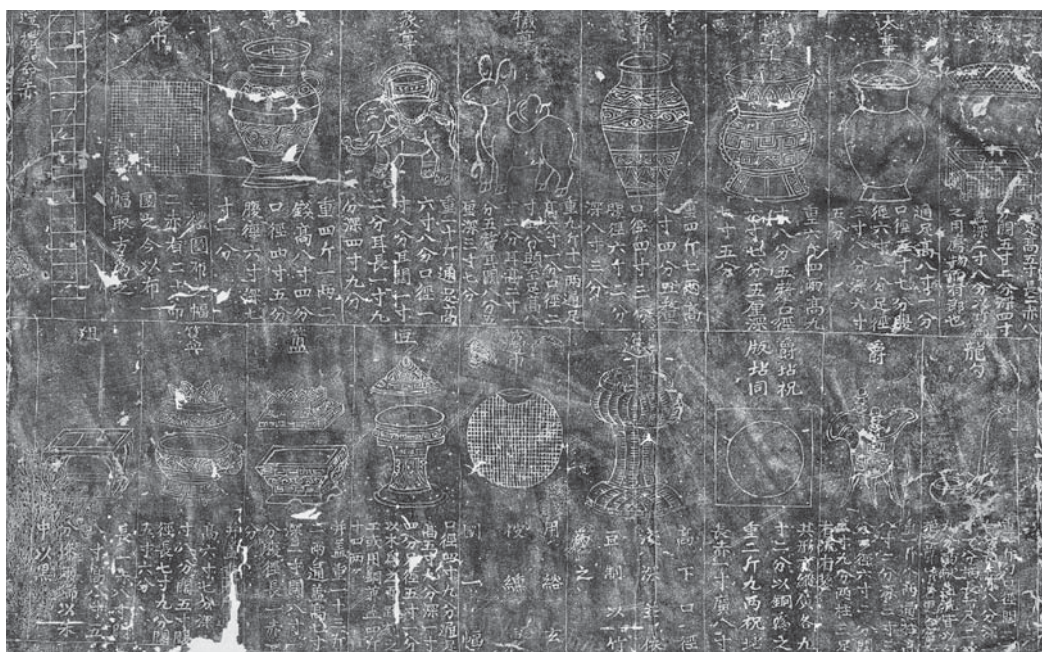


圖12 祭器圖 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元原石拓本（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圖12-1 壺尊 廣西桂林府學〈釋奠犧牲幣器服圖〉元原石拓本（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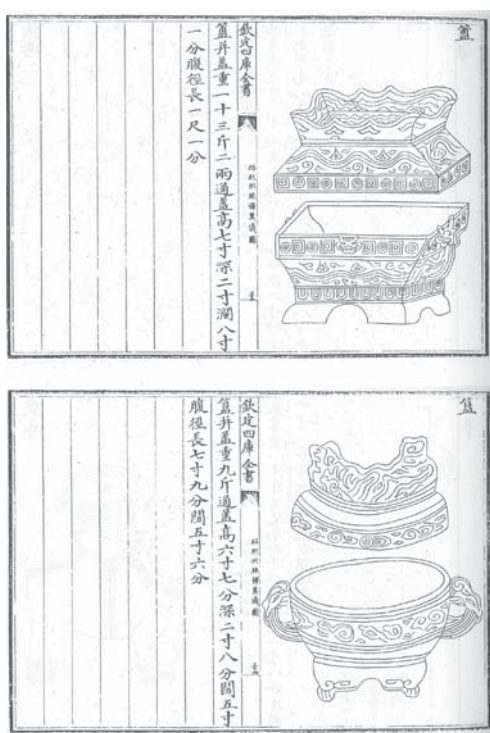


圖13 朱熹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收入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圖14 壺尊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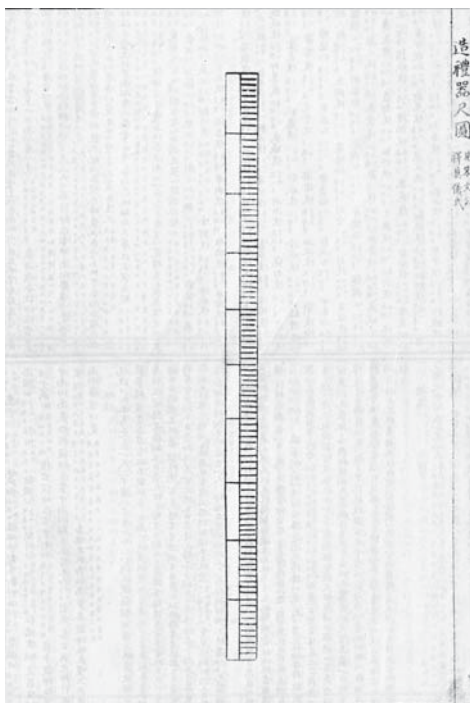


圖15 〈造禮器尺圖〉《世宗實錄》



圖16 粉青沙器象尊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17 粉青沙器象尊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18 粉青沙器簠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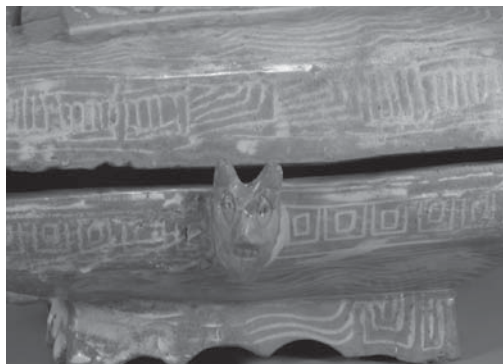


圖18-1 粉青沙器簠（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19 粉青沙器簋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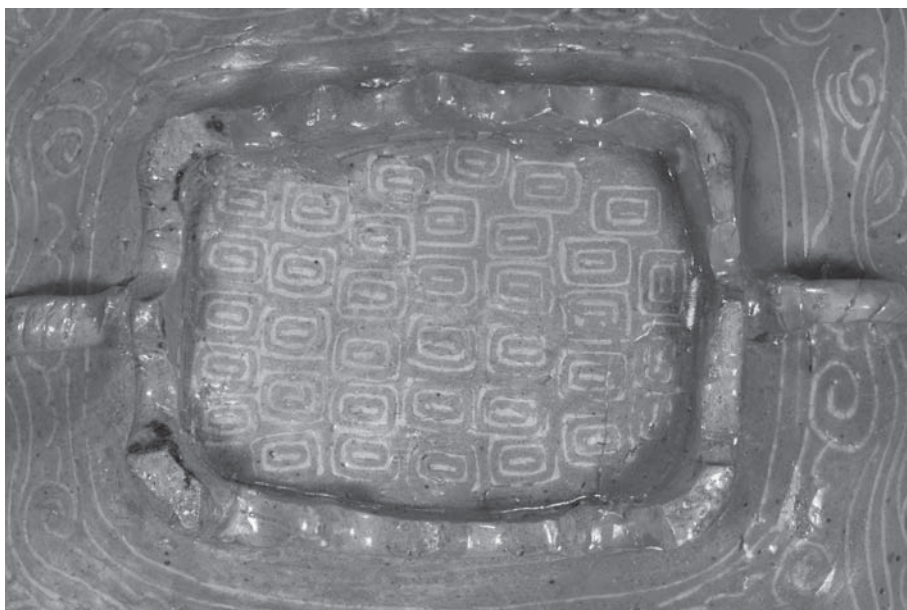


圖20-1 粉青沙器簋（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20-2 粉青沙器簋（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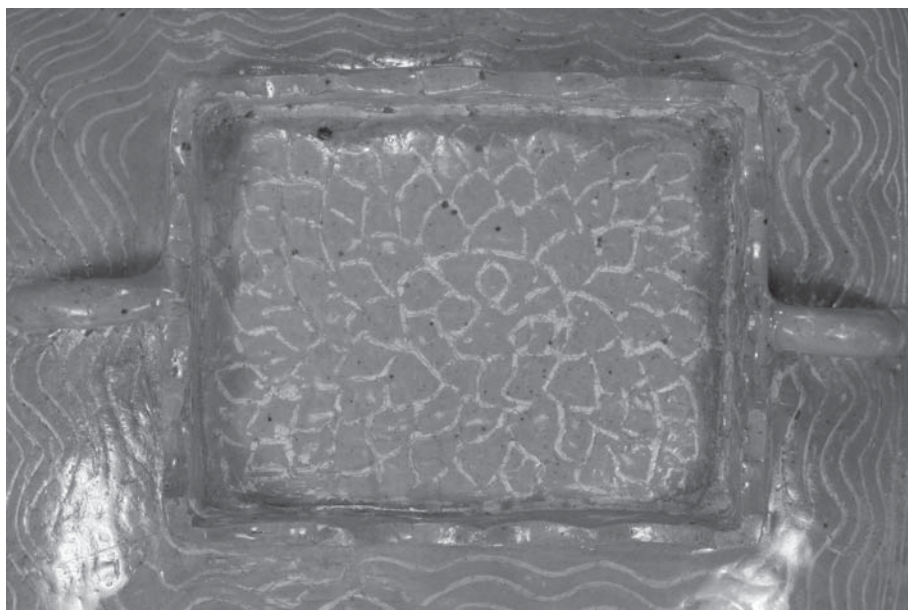


圖20-3 粉青沙器簋(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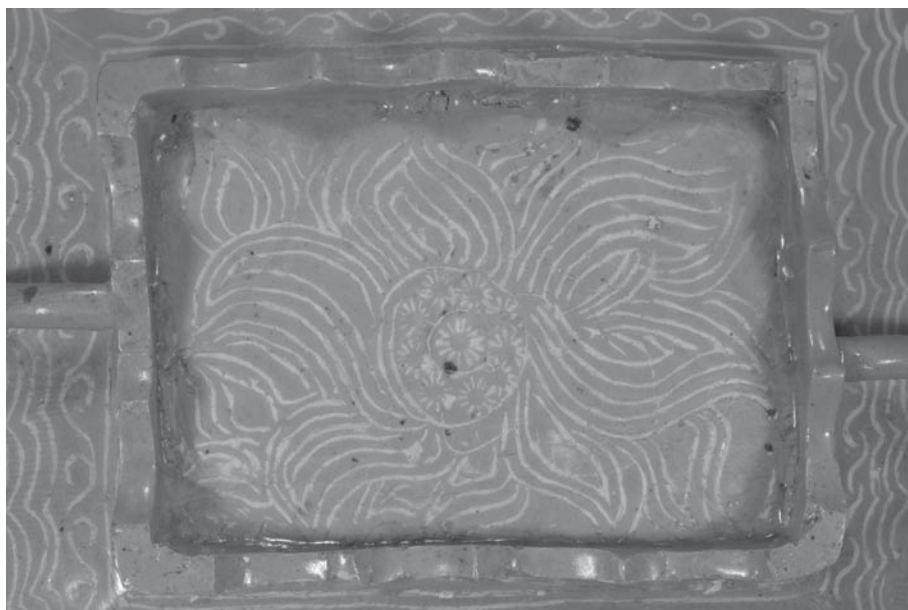


圖20-4 粉青沙器簋(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湖林博物館藏



圖2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山罍 朝鮮
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藏



圖21-1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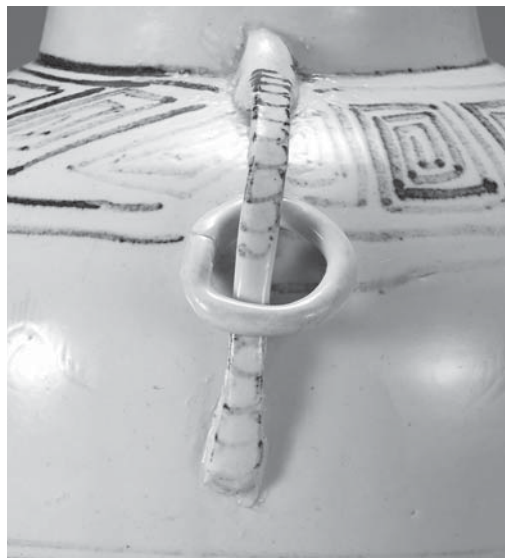


圖21-2 白瓷青花鐵花三山雷紋罍（側面局部）
朝鮮15世紀 韓國Leeum三星美術館
藏



圖22 山壘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圖23 山壘 《國朝五禮序例》，朝鮮成宗五年（1474）木刻本，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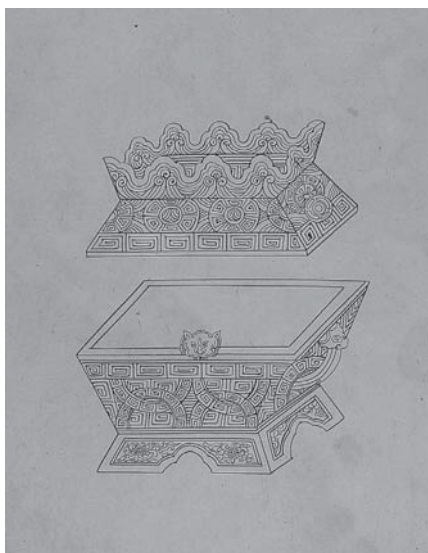


圖24 簠 《社稷署儀軌》（1783），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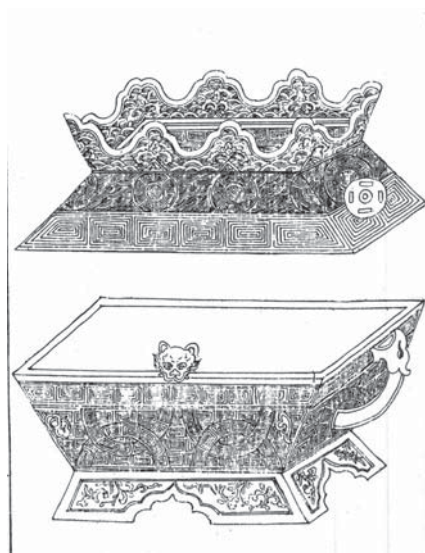


圖25 簠 《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圖26 簋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6-1 簋（局部） 朝鮮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銘）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27 鳥彝 朝鮮 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圖27-1 鳥彝線描圖 取自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頁375



圖28 著尊 朝鮮 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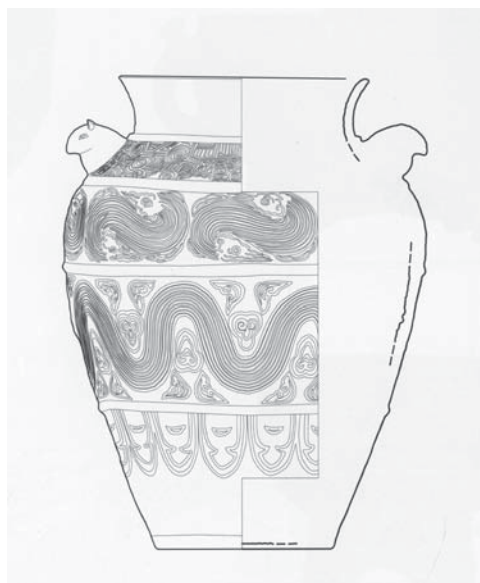


圖28-1 著尊線描圖 朝鮮 取自韓國首爾歷史博物館編，《宗廟廣場發掘調查報告書》，頁373



圖29 鳥彝 《祭器都監儀軌》(1611)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Kyuji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藏



圖30 著尊 《皇壇儀》(1747)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Kyuji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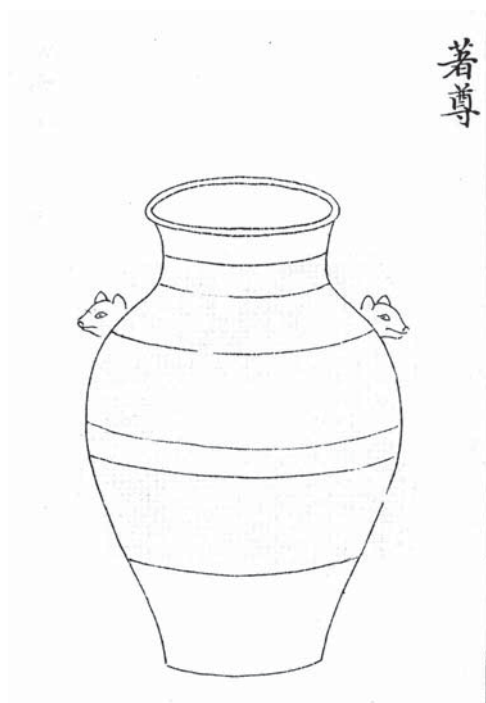


圖31 著尊 《明集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圖32 著尊 《國朝喪禮補編》(1758)
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 (Kyujanggak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藏



圖33 著尊 《世宗實錄》〈祭器圖說〉



圖34 黃銅簠 朝鮮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35 黃銅簋 朝鮮 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藏



圖36 湯島聖堂釋奠器 黑漆簋、豆、簋、俎 江戸時代 18世紀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A Background on the Compilation of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Jegidoseol, 祭器圖說) in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and the Formation of Ritual Ar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Lee, Jung-eu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ing *Sejong* (世宗 ; r. 1418-1450) of the Joseon dynasty w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fucian ruler of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Jegidoseol*, 祭器圖說) recorded in the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provided the most important standard for Joseon ceremonial artifacts for 500 years after the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5th century.

Taking Neo-Confucianism as its state ideology, the Joseon dynasty positioned itself as one of the feudal states (*jehuguk*, 諸侯國) to the Ming dynasty—the Empire of the Son of Heaven (*cheonjaguk*, 天子國). During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for establishing rites and ritual systems was to abide by the ancient system (*goje*, 古制) of China.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designing Joseon rituals were all Neo-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s, who were followers of the Chinese scholar Zhu Xi (朱熹 ; 1130-1200). They acquir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onfucian systems through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tual classics. Zhu Xi’s Diagrams of Ritual Vessels, included in his “Compendium of Rites for Confucius” (*Shidian yishi*, 釋奠儀式), eventually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In addition, Joseon officials chose ritual vessels from other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when the ones needed for their state rites we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Zhu Xi’s “Compendium of Rites for Confucius.” Thus, the Joseon dynasty gradually built its ritual artifact system.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had their origins in various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ir combination, however, was a re-enactment of the ideal past, reflecting the imagin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antiquity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standard established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also affected the creation of ritual ar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porcelain ritual wares wer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r metal ritual vessels. Although the materials were different, the porcelain ritual vessels were still faithfully modeled from the images of metal examples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thus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 porcelain style. The paradigm of ritual artifacts established by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Joseon dynasty and became the can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ritual art, the ancient system (*goje*), Zhu Xi, Heo Jo



圖37 宗廟大祭，出自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宗廟》，頁178

A Background on the Compilation of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Jegidoseol, 祭器圖說) in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and the Formation of Ritual Ar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Lee, Jung-eun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ing *Sejong* (世宗; r. 1418-1450) of the Joseon dynasty w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onfucian ruler of the early Joseon period.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Jegidoseol*, 祭器圖說) recorded in the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世宗實錄) provided the most important standard for Joseon ceremonial artifacts for 500 years after the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5th century.

Taking Neo-Confucianism as its state ideology, the Joseon dynasty positioned itself as one of the feudal states (*jehuguk*, 諸侯國) to the Ming dynasty—the Empire of the Son of Heaven (*cheonjaguk*, 天子國). During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for establishing rites and ritual systems was to abide by the ancient system (*goje*, 古制) of China.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designing Joseon rituals were all Neo-Confucian scholar-officials, who were followers of the Chinese scholar Zhu Xi (朱熹; 1130-1200). They acquir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onfucian systems through Zhu X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ritual classics. Zhu Xi’s Diagrams of Ritual Vessels, included in his “Compendium of Rites for Confucius” (*Shidian yishi*, 釋奠儀式), eventually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In addition, Joseon officials chose ritual vessels from other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when the ones needed for their state rites we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Zhu Xi’s “Compendium of Rites for Confucius.” Thus, the Joseon dynasty gradually built its ritual artifact system.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 Sejong* had their origins in various Chinese ritual classic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ir combination, however, was a re-enactment of the ideal past, reflecting the imagin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antiquity of the Joseon dynasty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standard established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also affected the creation of ritual ar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porcelain ritual wares wer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r metal ritual vessels. Although the materials were different, the porcelain ritual vessels were still faithfully modeled from the images of metal examples in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thus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special porcelain style. The paradigm of ritual artifacts established by the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Joseon dynasty and became the canon for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Pictorial Illustrations of Ritual Vessels, *Annals of King Sejong* (*Sejong Silok*), ritual art, the ancient system (*goje*), Zhu Xi, Heo Jo